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安徽省优秀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杨小草等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

窦崧玮 解码Z世代“零糖社交”：特征、成因与引导路径

李小凤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路径研究

魏志达 列宁在俄国城乡关系问题上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审视

2026年第1期（总第117期）

第25卷 双月刊 1月30日出版

# 征稿启事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是中共合肥市委主管，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合肥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本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注改革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围绕省情、市情选稿组稿，大力开展政策研究、市情研究、咨政研究和理论宣传，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征、地域特点、党校特色的理论宣传平台。

本刊于2003年入编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进入CNKI中心网站。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为进一步提高本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将本刊打造成为“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的学术名片和重要窗口”，现向社会公开征稿，热诚欢迎广大社科工作者惠赐佳作。

## 投稿须知：

1. 稿件应当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本刊特别欢迎关于“安徽省情、合肥市情”方面的研究报告。
2. 稿件字数以4000—10000字为宜。
3. 将正文以附件形式发过来，并将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电话、电邮、摘要、关键词（3—5个）、来稿日期、作者简介（出生日期、民族、职称职务、学历学位、研究方向等）放在正文标题下。
4. 参考文献、注释等放在文尾，勿用脚注或夹注。注释是作者对题名、标题或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须放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之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③……。参考文献是作者写论文时所用引文的出处或参阅的各种书刊资料，须集中列在论文的文末，参考文献序号标注：[1]、[2]、[3]……
5. 来稿文责自负，在不改变文章主要观点的前提下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文章作适当修改，若作者不同意修改请在来稿时作特别说明。
6.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等收录，如作者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在网站或光盘上同时刊出。
7. 请勿一稿多投。本刊的选稿周期为3个月，3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请作者自留底稿，来稿一律不退。
8. 本刊选稿以质量为唯一标准，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寄送2本样刊。
9. 本刊目前并无网上投稿平台，也未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代为征稿。一些打着本刊所谓“官网”名义的网上投稿、征稿平台，骗取作者审稿费、发表费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均属非法行为。请投稿作者切勿上当受骗。

本刊样刊浏览网址：<http://hfdx.hfzhi.com/>

本刊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230031

联系电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中共合肥市委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出版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陈得良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俊 王辉龙 王良仲 王 义 王 玉 王智源 江 飞  
江 浩 刘玉勉 孙维红 陈得良 何永义 李安福 李敏琪  
李宗开 范观兵 金 玥 周良金 胡爱敏 胡厚翠 凌德政  
陶晓娟 黄传霞 程千宜 瞿晓陆

马 俊  
黄宁平  
朱少家  
徐书琴

\*\*\*\*\*

## 理论视野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杨小草 王玉堂(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生成逻辑与核心要义.....翟俊豪(9)

## 策论园地

解码 Z 世代“零糖社交”:特征、成因与引导路径.....窦崧玮(17)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路径研究

——以河南省三门峡市为例.....李小凤(24)

本刊已许可本刊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230031  
(0551)62206658;62206629  
xb1233@126.com  
ISSN 1674-5000  
CN 34-1249/Z



学思札记

列宁在俄国城乡关系问题上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审视.....魏志达(30)

大众研究及其历史回响:马克思群众思想与勒庞群体理论比较分析

.....张国军 许丽娟(41)

信息荟萃

“全链条深度融合 合肥创新‘聚能’”等五则.....(55)

#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

##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杨小草 王玉堂

(东平县委党校,山东 东平 271500)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在当下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优秀企业支撑;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离不开企业家更好发挥作用。在迈向“十五五”、奋进“十五五”的新征程上,要一以贯之重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充分认识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作出的新部署、提出的新要求,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以完善的政策体系为保障,奋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关键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建议》 民营经济 民营企业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发展壮大民营经济。”<sup>[1]</sup>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sup>[2]</sup>,也是民营企业乘势而上、大有作为的时期。在迈向“十五五”、奋进“十五五”的新征程

上,各级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未来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部署上来,奋力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为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 一、深刻认识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重大意义

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sup>[3]</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收稿日期:2026-01-10

作者简介:杨小草,中共山东省东平县委党校讲师。王玉堂,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

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sup>[348]</sup>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我国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在发展中壮大、在壮大中做强,目前“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sup>[349]</sup>。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须一以贯之重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更好发挥民营经济在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生力军作用<sup>[4]</sup>。

(一) 民营经济是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引擎。一方面,民营企业具备对市场机制的敏锐洞察力,能够精准把握市场价值规律与供需关系,积极引导资源、技术、人才的有序流动与优化配置,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活力与效能。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强大引擎,是检验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重要标准,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优化升级的重要活力源。2016年年底,“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浙江首次被提出。这项刀刃向内、面向政府自身的自我革命,就是对行政审批效率痛点的回应,最终推动了全国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今天,民营企业活力正在展现中国经济潜力。在全

面深化改革中不断调整和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积极探索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途径,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民营企业将作出更大贡献。

(二) 民营经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迁过程中,技术创新不仅加快推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催生出以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在产业结构与发展模式不断重塑中,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基本经济制度中,明确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适应当下新型生产关系发展的基本条件,其关键正在于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与配置。民营经济不仅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使资本、技术、劳动力向更高生产率领域流动,也能借助创新驱动技术进步突破原有生产力发展阈值,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赋能高质量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

(三) 民营经济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大动力。在全球治理格局深度调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多重挑战与机遇的形势下,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民营经济则可以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强大动力。借助市场化机制与平台,民营企业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资金链等不同流程节点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紧跟新技术发展演进与产业变革的步伐,民营经济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实现更大发展,有利于加快培育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倒逼国内与国际在贸易、分工、合作等不同方面规则接轨,积极推动本土产品“走出

去”，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不断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国际经贸规则优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为国家间合作交流与增进共识提供广阔舞台。

## 二、深刻把握新时代对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判断形势是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sup>[9]</sup>形势决定政策，正确判断形势才能科学布局未来。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必须深刻把握《建议》关于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深刻认识新的形势环境对民营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带来的新挑战。《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引导民营企业通过自身改革发展、合规经营、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促进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作出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承担起更重责任、发挥出更大作用。”<sup>[10]</sup>新征程上，民营企业要“肩负起更大使命、承担起更重责任、发挥出更大作用”，就必须正确分析形势，在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中发展壮大自己。

（一）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sup>[7]23</sup>，“是新时代的硬道理”<sup>[8]</sup>。《建议》强调，“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sup>[1]</sup>。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实现了规模和数量的快速发

展，呈现出“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sup>[3]479-480</sup>。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推动高质量发展，实际是一个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给民营企业带来新的挑战。民营企业必须顺时应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以高质量发展筑牢民营企业不断壮大、做优培强的根基。

（二）新时代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实体经济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基，引导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sup>[9]</sup>。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为民营企业转型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同时也带来转型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问题。民营企业要实现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迎头赶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抢抓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推动实现发展转型。

（三）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不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提出的新要求。《建议》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sup>[1]</sup>；“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sup>[10]157</sup>。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制裁、打压加剧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态势。民营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直面挑战，涵养世界眼光，主动走出去，拓展海外业务，参与全球

竞争,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利用国际产业分工,推动国际化经营,努力做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上的关键企业。

(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出的新要求。《建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sup>[4]</sup>。当前,一些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产权制度、经营管理还存在着不完善、不健全、不规范等诸多问题,与“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的要求相比存在不小差距。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必须推动民营企业按照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着力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内部监督、健全风险防范机制,不断完善劳动、人才、知识、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使用、管理、保护机制”<sup>[4]</sup>,持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

### 三、奋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民营优秀企业支撑;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离不开民营企业更好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先富促共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sup>[4]</sup>这一重要论述,是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明确要求,更是深情厚望、殷殷嘱托,同时也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胸怀报国志。勇担使命、矢志报国,企业发展才有前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不断提升理想境界,厚植家国情怀,感恩伟大时代,感恩党的政策,富而思源、富而思进,与祖

国同进步,与人民齐奋斗,坚定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sup>[4]</sup>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sup>[3477]</sup>,既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也是改革开放受益者。矢志报国既是民营企业应有的境界与格局、责任与担当,也是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驱动力。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广大民营企业家“要满怀创业和报国激情”<sup>[4]</sup>,把兴企报国作为自己的光荣使命,主动为国分忧、为国担当。要主动对接、自觉服务国家战略,深耕主业做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比拼赶超,推动实现更大发展;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将市场活力与创新基因深度融合,不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多作贡献。

(二)一心谋发展。奋斗创造伟业,发展铸就辉煌。一心谋发展,才能推动企业实现大发展。民营企业从最初的模仿到今天的创新实践,在探索中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创造辉煌,靠的就是“一心谋发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规划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提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突破”<sup>[4]</sup>。规划引领未来,政策就是机遇。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抓住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历史性机遇,瞄准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通过创新驱动推动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增强核心竞争力;对内不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对外不断拓展新的市场空间,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伟大实践中大显身手。

(三)守法善经营。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唯法而尊、循法而行、依法而治的法治国家<sup>[12]</sup>,守法是公民和一切组织的义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法经营,这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长远发展之道。”<sup>[13]490</sup> 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守法经营是应尽的义务,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类所有制企业都必须守法经营。通过守法经营,民营企业可以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社会公信力,从而推动企业更好更快发展。近年来,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举措,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特别是通过打破市场准入隐性壁垒,推动基础设施、重大科研设施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以保障民营企业依法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依靠法治手段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严格规范涉企执法行为,避免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必要的干扰。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sup>[2]</sup>,必须增强法治意识,自觉遵守法律规则,坚持在法治轨道上谋划和推进企业发展,努力做到守法善经营。

(四)先富促共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sup>[13]53</sup>。求富是人们的普遍心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sup>[7]439</sup> 但社会发展的规律表明,富裕总是有先有后。民营企业不仅要通过一心谋发展、守法善经营成为“先富”者,更要在带后富、促共富上彰显责任担当,努力

成为先富促共富的贡献者、推动者,更好展现民营企业独特的社会价值,更好彰显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爱国情、报国志。新时代新征程,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要深刻认识自身肩负的时代重任,“树立正确价值观和道德观”<sup>[11]</sup>,在做大做强企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抓好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参与力所能及的公益慈善事业,多向社会奉献爱心,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sup>[1]</sup>上挺膺担当。

(五)政策作保障。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必须优化政策供给、确保政策落实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这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凡是党中央定了的就要坚决执行,不能含含糊糊、拖拖拉拉,不能打折扣。”<sup>[11]</sup>要进一步全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sup>[11]</sup>,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持续优化民营经济营商环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sup>[13]478</sup>。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和政策执行方式,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创新民营经济服务模式,让民营企业从政策中增强获得感。强化执法监督,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离不开民营企业参与和支撑。”<sup>[11]</sup>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民营经济不断壮大,在当下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强调“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sup>[72]</sup>。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sup>[14]</sup>,部署了一系列改革举措。2018年11月和202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民营经济发展进行战略擘画、战略引领,对民营企业健康成长、发挥作用提出明确要求。2023年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出台,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2025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越来越健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越来越好,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大展宏图恰逢其时。新征程上,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sup>[3486]</sup>,奋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进展、新成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突破。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N].人民日报,2025-05-01.
- [3]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4] 李玉举,邓永波,肖新建.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J].前线,2025(4):39-42.
- [5] 习近平.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J].求是,2026(1):4-10.
- [6]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3-07-20.
- [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8]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求是,2024(11):4-8.
- [9] 习近平在浙江考察时强调 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9-26.
-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11] 习近平.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J].求是,2025(16):4-9.
- [12] 杨小草,王玉堂.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及其提升进路[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4(6):3-8.
- [13] 杨朝明.论语诠解[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13.
- [1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

责任编辑:朱少家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生成逻辑与核心要义

翟俊豪

(桂林理工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传承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我革新思想、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重要思想由内涵要义、目标指向、根本原则、实践要求、政治保障等五个部分构成。这一重要理论成果科学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找到了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党的建设 历史周期率

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聚焦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时代课题作出系统回答,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内涵丰富、结构严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意味着我们党对执政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党

的二十大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sup>[1][64]</sup>的重大原则,为新征程上推进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将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持续进行战略擘画和具体部署。从“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到“五个进一步到位”的重点任务,不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为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提供了根本遵循。立足这一现实背景,系统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生成逻辑与核心要义,不仅是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理论自觉的内在要求,更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

---

收稿日期:2026-01-16

作者简介:翟俊豪,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的伟大工程的现实需要，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生成逻辑

(一)理论之维: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直接使用“自我革命”的概念,但他们在创建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围绕理论本质、政党属性、自身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已然蕴含自我革命的思想基因,构成了这一重要思想是直接理论源头。

其一,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哲学方法论支撑。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批判时,马克思明确指出,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sup>[2]94</sup>。这种批判性不仅指向客观世界的改造,更内在要求革命主体自我审视、自我革新,不断克服自身问题,从而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核心方法论。其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属性,赋予了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勇气与底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sup>[3]413</sup>,始终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根本任务。这种无私性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不受自身利益羁绊,具备直面问题、自我革新的勇气和力量,这正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底气所在。其三,严肃的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原则,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锐利武器。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肯定巴黎公社“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sup>[4]109</sup>的勇气和监督实践。恩

格斯认为“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sup>[3]79</sup>,强调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的重要性。列宁也指出“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sup>[5]334</sup>。这些论述共同确立了自我批评在加强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使之成为推进自我革命的关键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核心原则,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赋予了其新的时代活力,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守正创新理论品格。

(二)历史之维:传承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sup>[6]500</sup>。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自我革命,在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中淬炼成长、积累宝贵经验,既确保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永葆生机活力,也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滋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危局转折中奠定了自我革命传统。八七会议坚决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推动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遵义会议直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沉痛教训,在军事和组织上拨乱反正,树立了党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典范。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sup>[7]210</sup>的方针,集中整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实现了全党思想、政治、组织上的空前团结统一。党的七大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写入党章,使自我革命成为党的鲜明标识。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执政考验中深化自我革命实践。取得在全国执政地位后,部分党员滋长了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情绪,甚至出现贪污腐败现象。1951年,党中央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sup>[8]191</sup>,有效遏制了党内不良风气的蔓延。这一在执政条件下践行自我革命的重要探索,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积累了宝贵经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在时代变革中继续推进自我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恢复和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潜滋暗长,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sup>[9]403</sup>为此,党中央以反对领导干部特殊化为突破口,大力推进作风建设。后续开展的“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主题教育活动,始终聚焦不同阶段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持续深化自我革新。

纵观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勇于自我革命是贯穿始终的鲜明主线,铸就了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品格。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宝贵经验,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奠定了历史根基<sup>[10]</sup>。

(三)文化之维: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我革新的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sup>[11]150</sup>。其中所蕴含的革故鼎新、修身自省、居安思危等思想精华,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

其一,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为党的自我革命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中华文明自古就有变革求存、自我更新的鲜明品格。《周易》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sup>[12]262</sup>揭示了主动求变方能长久的客观规律;《大学》倡导“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sup>[13]250</sup>,表达了持续革新的进取理念;《诗经》所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传递出破除旧弊的改革勇气。这种革故鼎新的文化基因,为党在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支撑。其二,修身自省的道德自觉,为党的自我革命确立了反求诸己的内在准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将向内审视、自我完善视为立身成事的根本。《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sup>[13]8</sup>与“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sup>[13]45</sup>的训诫,构成了君子自省的基本准则;《礼记·大学》将“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sup>[13]265</sup>,点明了修身是立世之基;宋代朱熹提出“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sup>[14]42</sup>,进一步深化了自省自新的文化传统。这种注重主体道德自觉的文化基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推动党实现自我净化与自我完善,提供了宝贵思想滋养。其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为党的自我革命培育了防微杜渐的历史自觉。中华文明对治乱兴衰规律有着深刻洞察,孕育了浓厚的忧患意识。《周易》告诫“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sup>[12]266</sup>,提醒人们在安稳之时保持警醒;《孟子》总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sup>[15]269</sup>,揭示了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历史辩证法。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sup>[16]165</sup>,强调防范风险的重要性。这种深植于民族精神的忧患意识,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应对“四大考验”、防范“四种危险”,以自我革命防微杜渐、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革新思想中汲取深厚养分,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彰显了坚定的文化自信。

(四)实践之维:立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植根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sup>[17]</sup>。面对复杂严峻的执政考验和自身建设的突出课题,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破解难题、永葆生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正是这一思想最直接、最鲜活的根基。

其一,党的自我革命是应对百年变局、抵御风险挑战的战略抉择。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持续蔓延,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凸显。要在变局中开新局、在危机中育新机,关键在于锻造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自我革命正是党主动识变应变的战略举措。通过刀刃向内的自我锻造,确保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引领中国这艘巨轮在复杂变局中行稳致远。其二,党的自我革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政治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规模之大、难度之高、开创性之强前所未有。前进道路上,思想不纯、组织涣散、腐败滋生等问题都可能成为“拦路虎”。只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消极因素,在自我革新中锻造坚强领导核心,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政治引领和可靠组织保障。其三,党的自我革命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时代答案。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虽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严峻<sup>[18]</sup>,最大风险隐患仍在党内。坚持同自身缺点作斗争、坚

定推进自我革命,是关系党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因素,管党治党须臾不可松懈<sup>[19]</sup>。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自我革命”的重大政治概念,深化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为破解“六个如何始终”等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根本路径,是指引党实现长期执政的实践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深植根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既是对管党治党经验的理论升华,又引领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为党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注入了深厚底气与不竭动力。

##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非凡的政治魄力和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围绕内涵要义、目标指向、根本原则、实践要求、政治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时代课题,构建了严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以“四个自我”揭示自我革命的内涵要义

党的自我革命是一项由内而外、破立并举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阐释了自我革命的深刻内涵,即“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四个自我”构成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为新时代深化自我革命提供了根本遵循。

自我净化是自我革命的前提,核心是去腐生肌、保持政治本色。要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聚焦突出问题,“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sup>[20]</sup>,在激浊扬清中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同时,依托严

肃的纪律约束与常态化思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对照党章党规开展自我批评与自我纠错,锤炼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自我完善是自我革命的基础,核心是补短板、强弱项。要着眼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精准修复肌体疾患、增强党的功能,锻造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立足制度建设的根本性作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健全权力运行机制、提升制度执行力,为自我革命提供坚实保障。自我革新是自我革命的关键,核心是实现思想与实践的创新突破。要勇于冲破陈旧观念和僵化体制的束缚,以持续深化改革铲除腐败滋生土壤,营造优良的政治生态。同时,主动顺应时代发展革新思想理念,持续推进理论、实践、制度等各方面创新,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彰显与时俱进的生机活力。自我提高是自我革命的目的,核心是全面提升党的执政本领和政治能力。要强化理论武装,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把握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同时,加强实践锻炼,引导党员干部在攻坚克难中增长才干,确保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永不僵化、永葆生机。

“四个自我”深刻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内涵要义——依靠自身力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破立并举、标本兼治中推动党的执政能力整体提升,为党的自我革命向纵深推进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以“三个不变”明确自我革命的根本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sup>[14]</sup>。

这“三个不变”的战略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总结大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如何永葆长期执政地位”这一时代课题的鲜明回答,明确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全部实践都必须指向维护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与革命性。

“不变质”就是要坚守党的根本政治属性与初心使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本质所在。要通过常态化思想淬炼,严防党的肌体被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或特权思想侵蚀。“不变色”就是要永葆党的革命精神与政治底色。我们党必须传承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始终将人民利益置于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践行“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sup>[17]64</sup>的群众路线,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同时,坚决纠正贪图享乐的惰性思想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确保党在任何风险挑战面前都能与人民同心同德、同向同行。“不变味”就是要赓续党的优良作风与光荣传统。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所取得的精神财富,必须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要坚决反对一切损害党的形象、破坏党群关系的歪风邪气,通过严肃的纪律整饬与作风锤炼,让党的优良传统历久弥新,不断凝聚党心民心。

“三个不变”互为支撑,有机统一,从政治本质、精神面貌、作风形象三个维度为党的自我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其最终旨归,是确保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始终成为人民衷心拥护的坚强领导核心,稳步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三)以“四个统一”把握自我革命的根本

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四个统一”,深刻揭示了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明确了自我革命需妥善处理的四对关系,为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阐明了自我革命与党的领导的内在一致性。推进自我革命的目的是锤炼更坚强的领导核心,绝不是削弱党的领导。一方面,必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sup>[20]589</sup>,坚决同一切损害党的领导、动摇执政基础的行为作斗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另一方面,必须严肃整治党内突出问题,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切实增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二者相互促进,确保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愈发坚强。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是推进自我革命的关键,深刻体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守正是创新的基础,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坚持党的性质宗旨与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创新是守正的保障,要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与事业发展需求,勇于推进理论、实践、制度等各方面创新,以新思路应对新矛盾。唯有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才能推动自我革命持续深化,确保党始终引领时代。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是激发党员干部活力的重要原则。严管是厚爱的前提,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通过严格的管理和监督,约束党员干部言行,筑牢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厚爱为严管提供支撑,要注重思想引导与关怀激励,保护并调动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二者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激励与约束并重,推动党的自我

革命向纵深发展。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是形成自我革命合力的关键。各级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严格的教育、管理和监督<sup>[21]</sup>。广大党员干部要主动担当,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对照党规党纪自觉检视整改,在“红红脸、出出汗”中增强政治免疫力。只有将组织严密性与个体自觉性相结合,汇聚双向力量,才能为自我革命注入持久动力。

“四个统一”相互联系、有机融合,共同构成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原则,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锻造坚强领导核心提供了科学指引。

(四)以“九个以”擘画自我革命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提出的“九个以”实践要求,系统擘画了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科学路径与行动纲领。这一系列要求环环相扣、构成了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sup>[22]</sup>,系统回答了自我革命的领导力量、目标指向、动力来源等根本性、方向性问题。

一是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明确了自我革命的领导力量。党的领导和自我革命是内在统一的,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自我革命锚定正确方向。二是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明确了自我革命的实践方向。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sup>[6]93</sup>。党通过自我革命实现自身锻造,最终目标是推动社会发展。三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明确了自我革命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引。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深刻领会其蕴含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自我革命提供科学指引。四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

把握了自我革命的核心命题。自我革命是总结管党治党经验得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也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五是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指明了自我革命的重点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始终保持解决这一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六是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明确了自我革命的政治保障。要构建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自我革命提供坚实支撑。七是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明确了自我革命的组织基础。要不断健全完善党的组织体系,选拔任用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培养对党忠诚、敢于担当、善作善成的骨干队伍。八是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明确了自我革命的关键任务。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sup>[6]105</sup>,要坚持标本兼治、防范为主,以人民满意度为标尺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九是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明确了自我革命解决问题的重要路径。要推动两种监督贯通融合、相得益彰,实现自律与他律统一,为自我革命注入持久动力。

“九个以”各有侧重、相互支撑,构成完整的行动纲领,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的重大课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核心方法论。这一实践要求体系,既为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新征程上深化自我革命、锻造坚强领导核心提供了科学指引。

(五)以“五个进一步到位”压实自我革命的政治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集体学习时提出的“五个进一步到位”重要要求,从认识深化、党性锤炼、权

力制约、纪律维护、责任落实等五个维度层层递进,为压实自我革命政治责任、推动其深化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第一,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要进一步到位,增进思想认同。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面临的任务更重、挑战更多,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须臾不可放松。当前,部分党员干部存在“担心自我革命损害党的形象、反腐败会影响发展”等认识误区,容易导致自我革命流于形式,必须坚决纠正。事实上,自我革命正是党净化肌体、提升能力、赢得民心的关键。全体党员要主动“把自己摆进去”,领导干部更应率先垂范,让自我革命意识入脑入心。第二,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要进一步到位,激发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sup>[23]</sup>,其核心是坚定理想信念。要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服务人民、推动发展的实践中砥砺初心;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强化年轻干部党性教育,在选人用人上要始终突出政治标准、注重党性成色。第三,权力规范运行要进一步到位,紧扣自我革命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sup>[24]121</sup>,规范权力运行是自我革命的“牛鼻子”。要聚焦“关键少数”以及资源、人事等关键领域,围绕重大决策、资金使用等风险环节,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党员干部要牢记权力来自人民,敬畏人民、敬畏法纪、敬畏权力,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第四,从严监督执纪要进一步到位,强化自我革命的纪律保障。监督上,完善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的贯通协调机制,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抓早抓小、强化日常监督;执纪上,将纪律要求转化为硬举措,自觉同一切违纪行为作斗争,对不正之风露头就打,把握风腐一

体特征加大同查同治力度,巩固严的氛围。第五,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要进一步到位,压实自我革命的主体责任。管党治党责任环环相扣,任何一环失守都会导致体系失效。各级党组织要扛起政治责任,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更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要健全压力传导机制,将“严”的要求一贯到底,形成上下联动、全员尽责的责任格局。

“五个进一步到位”相互贯通、缺一不可,既是压实自我革命政治责任的行动指南,也为新征程上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锻造永葆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 三、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立足“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将其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面,持续锤炼“四个自我”能力,全面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始终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在常态化、制度化的革命性锻造中,推动党始终保持坚强战斗力与蓬勃生机活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开创党的建设与国家发展新局面。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列宁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0] 胡洪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原创性贡献[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5):33-45.
- [1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2] 周易译注[M].韩立平,译注.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 [13] 论语·大学·中庸[M].陈晓芬,徐儒宗,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 [15] 孟子译注[M].金良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16]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王弼,注;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9] 陈松友,周方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下转第23页)

# 解码 Z 世代“零糖社交”:特征、成因与引导路径

窦崧玮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社会结构的转型重塑了青年社交生态,推动其社交行为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零糖社交”作为新型社交形态,呈现出以自我需求为核心的社交导向、理性明确的社交边界、去压力化的社交氛围追求等特征,精准契合 Z 世代的社交诉求,被这一群体广泛认同与接纳。作为青年社交心理与行为范式的现象性投射,“零糖社交”的成因深植于自我意识的觉醒、数字技术的迭代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之中。为此,需着力引导青年树立适度零糖的理性社交观念、营造开放包容的良好社交生态环境、培育青年精准联结的社交素养,助力青年群体构建健康和谐的社交关系。

**[关键词]**Z 世代 “零糖社交” 特征样态 成因溯源 引导路径

“零糖社交”这一概念,源于“零糖”生活方式,是将无添加、低负担的理念从饮食领域延伸至社交领域,特指 Z 世代在社交中追求的无利益纠葛、无心理压力、无责任捆绑的纯粹社交关系。这种社交模式高度契合 Z 世代追求自由、独立与个性化的价值取向。其特征样态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主体性觉醒,以自我需求为核心构建以我为主的社交导向;二是边界感重塑,通过理

性划界实现相融而不依附的社交关系建构;三是轻量性追求,追求去压力化的社交氛围。这一现象的成因是自我意识觉醒推动 Z 世代完成从依附性价值到主体性价值的转变,数字异化引发的社交过载促使 Z 世代通过“零糖社交”进行精力管理,流动社会下人口流动加速、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等现实,推动 Z 世代重构社交关系以适应环境变化。青年作为社会中最有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叙事及其话语策略研究”(立项编号:23CKS030)暨吉林省高教学会 2025 年重点自筹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大思政教育研究”(立项编号:JGJX25C08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6-01-21

作者简介:窦崧玮,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生气、最有闯劲的群体,“蕴含着改造客观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无穷力量”<sup>[1][33]</sup>,深入探究Z世代“零糖社交”的特征和成因,进而凝练出具有针对性的引导策略,这对于保障青年社交生态健康、助力青年全面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

### 一、Z世代“零糖社交”的特征样态

#### (一)以自我需求为核心的社交导向

Z世代追捧的“零糖社交”,是青年群体自我意识觉醒与强化的具象化表达。这种摒弃过度情感捆绑、坚守自我边界的社交模式,打破了传统社交中以关系为先的惯性思维,将自我需求置于社交的核心,成为当代青年彰显独立人格的鲜明注脚。第一,在社交价值取向上,“零糖社交”强调自我独立性,主张不过分沉溺于亲密联结、不过分依赖外界情绪供给,通过与他人保持适度边界,实现情绪价值的自我满足与内在平衡。这种拒绝情感依附的社交选择,本质是青年自我意识在人际交往中的直接投射。他们不将自我情绪的稳定寄托于他人,而是以清淡自持的互动模式守护自我主体性。正如零糖甜点摒弃多余糖分、保留食材本真味道,“零糖社交”也以不依赖外在情感黏腻的姿态,坚守自我主导的社交选择。第二,在社交行为逻辑上,“零糖社交”通过不主动、不捆绑、不索取、不期待的互动准则,彰显青年对自我边界的明确认知与坚定守护。青年在社交中的情绪平淡、举止有度,并非冷漠疏离,而是对过度卷入的主动规避。他们拒绝被他人情感捆绑,不迎合不必要的社交期待,既以适度疏离抵御外界对自我空间的过度侵入,又以坦诚的沟通坚守自我主导权,充分体现了自我意识对社交行为的深层规制。第三,在社交核心诉求上,“零糖社交”以“淡而不疏”“去负担

化”的相处模式,践行青年以自我为先的社交价值排序。青年通过为社交“做减法”,优先考量自我舒适,不被关系绑架,不对联结上瘾,让人际交往回归简约清爽、自在惬意的本真状态。这种对自我舒适区的坚守,拒绝为满足他人而委屈自己,正是自我意识在社交追求中的集中彰显。

#### (二)理性明确的社交边界

Z世代“零糖社交”往往伴随着对“自我领地”的明确界定,本质上是青年用行动划定理性社交边界。他们在交往中保持言谈举止的分寸感,拒绝过分介入和无边界的刨根问底,把握好自我与他人的相处尺度,既拒绝外界随意侵扰自我空间,也不贸然干涉他人生活。“熟不逾矩”的社交状态,正是青年对自我边界坚定守护的生动体现。第一,从交往追求来看,其“淡而不寡”“疏而不隔”的交往理想,本质是对边界的精准把握,最终形成相融而不依附的社交关系。第二,从交往态度来看,“零糖社交”让年轻人挣脱了为社交而社交的桎梏,转而主动追求适合自己的社交方式。交往双方保持边界感,即彼此尊重、不贸然介入对方的生活、在共识中自然达成情感共鸣,深刻彰显了年轻人向内求索、为己择友的理性交往态度。第三,从交往准则来看,“零糖社交”秉持既不随意侵扰他人私人空间,也不委屈自己迁就他人的交往原则,通过打破过度绑定的社交枷锁,给予个体充分的空间自主权,让社交主体在明确的范围内既无需承受社交内耗,又能收获真挚的情感、温暖的陪伴,最终实现人际交往向轻松自在本质的回归。

#### (三)去压力化的社交氛围追求

追求轻松无压力的交往氛围,是Z世代“零糖社交”的特征样态之一。他们厌倦了

传统社交中繁琐的礼仪束缚、复杂的人际关系等,更倾向于在轻松、自在的环境中开展社交。“零糖社交”通过轻量化、流动化、碎片化的联结互动,精准契合了当代青年对去压力化的社交氛围的追求。第一,“零糖社交”以轻量化互动构建松弛的社交氛围,将去负担化贯穿交往全过程。它倡导“淡而不疏”的相处之道,既保持适度的情感联结,又拒绝刻意维系与过度纠缠,致力于打造“亲密而不越界、互动而无压力”的良性关系形态。这种低负担、浅交情的互动,摆脱了传统社交中过度热情、人情绑架等“甜腻负担”。第二,“零糖社交”以流动化特征守护舒展的社交氛围。传统熟人社会的社交模式以高黏稠度的人情往来为核心,过度依赖情感绑定,易形成沉重的社交枷锁。而在现代社会快速变革背景下,“零糖社交”打破这一固化框架,将流动性与灵活性置于突出位置。Z世代在社交中更注重自我感受的真实表达,明确拒斥边界模糊型关系与“人情债”带来的压力,倡导“降糖”式交往,以无过度依赖、无强制索取的灵活互动,化解社交中的紧绷感,为自己营造舒展自在的交往环境。第三,“零糖社交”以碎片化形式适配轻松的社交节奏。与传统社交的连贯捆绑式联结不同,它以碎片化互动适配Z世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通过即时联结、适时断联的策略,适配短期化、流动化的人际关系——不追求长期捆绑,不刻意经营关系,需要时高效配合,结束后自然疏离。这种模式既避免了长期关系带来的压力与束缚,又能让社交始终保持轻松自在,完美契合青年对无压力社交的追求。

## 二、Z世代“零糖社交”的成因溯源

### (一)Z世代自我意识觉醒

Z世代作为在物质相对丰裕、思想高度开放环境中成长的一代,其个体意识的觉醒程度远超前代。这种自我觉醒直接推动了其社交认知的深层革新,使其在社交中完成了从依附性价值到主体性价值的转变,这也成为“零糖社交”兴起的内在动力。与成长于集体主义氛围、习惯在社交中寻求群体身份认同的70后、80后不同,Z世代从童年时期便被赋予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家庭教育中的个性化培养理念与多元文化的持续浸润,让他们早早建立起清晰的自我认知与边界感。这种边界感在社交中,直接体现为对自我感受优先的坚持。他们不再将社交视为维系生存关系、获取外部资源的必需品,而是将其定义为实现情感共鸣、丰富精神世界的增值品。当出现过度迁就他人、隐藏真实需求、为维持表面和谐而委屈自己的情况时,Z世代往往会果断“断舍离”。因为在他们的价值排序中,牺牲自我感受换取的社交关系,本质上是高成本、低回报的“情感糖精”,与“零糖社交”所追求的纯粹、无负担背道而驰。同时,Z世代的自我觉醒还表现为对真实社交的极致追求。在颜值经济、人设盛行的当下,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经过精心包装的完美形象,这种表演式社交带来的强烈疏离感,恰恰反向强化了Z世代对本真社交的追求。他们厌倦了在社交中“戴面具”,反感为迎合他人期待而进行的有效互动,更渴望在关系中实现本真自我的表达与被接纳。“零糖社交”所倡导的不刻意讨好、不勉强维系的相处准则,精准契合了他们对真实关系的需求,与朋友相处时可以直言不讳,在社交聚会时可以随性而至。这种社交模式,让Z世代在社交关系中摆脱了表演压力,实现了情感层面的松弛与自由。此外,在Z世代的

价值体系中,社交的核心价值在于情感滋养,而非人情负债。那些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维系、却无法带来正向情感满足的无效社交,如同食品中大量的“隐形糖”,表面看似无害,实则持续消耗自身的情感能量。因此,Z世代主动收缩社交圈、筛选社交对象,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在与自己价值观契合、能够实现情感双向奔赴的关系中。这种理性的社交选择,本质上是个体自我意识觉醒后对高质量社交的主动追求,也是其主体性价值在社交领域的落地实践。

## (二)数字技术的变革迭代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Z世代提供了多元化的社交渠道,但数字异化也让他们陷入了严重的社交过载困境。社交媒体的泛连接属性,在为Z世代带来无门槛便捷社交的同时,也将他们置于全天候在线的社交压力之下。微信的消息红点提示、朋友圈的点赞评论互动、各类社交App的实时推送,不断挤压着Z世代的私人时间与心理空间,使其陷入被动社交的困境。“零糖社交”正是他们对抗这种压力的主动尝试——关闭社交App的消息推送、设置免打扰模式、定期清空冗余的社交动态,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对自身精力的主动掌控,通过剥离社交中裹挟的“无效信息糖衣”,最大限度减少技术带来的无差别精力损耗。同时,算法推荐催生的“信息茧房”,进一步加剧了Z世代的社交疲惫。算法通过分析用户的社交偏好,持续推送同质化的内容与同频的社交圈层,这种精准匹配看似提高了社交效率,实则让Z世代的社交陷入了单一化、封闭化的困境。长期处于“信息茧房”中,Z世代不仅难以接触到多元的观点,更会因算法营造的虚假共鸣产生社交认知偏差。当他们意识到,这种算法推荐的

所谓同频社交,不过是商业逻辑下的“人造糖精”,便会对这种被算法操控的社交模式产生本能抵触。“零糖社交”所追求的自主社交,正是对算法异化的反抗。他们主动跳出算法推荐的固化圈层,通过线下真实互动、参加基于兴趣的自发社群等方式构建社交关系,摆脱算法对社交选择的操控,实现对自身精力的合理分配。此外,数字社交的虚拟化也让Z世代逐渐意识到线上社交的局限性。线上聊天的延迟性、碎片化使得情感表达不够完整,表情包、网络热词的过度使用也让社交互动变得符号化,难以传递真实的情感温度。“零糖社交”强调的少而精的线下互动,正是他们对数字社交异化的一种矫正,通过减少线上虚拟社交的精力消耗,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能够带来真实情感连接的关系中。

## (三)流动社会下社会关系重构

“‘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sup>[23]</sup>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快速转型的时期,人口流动加速、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深刻影响着Z世代的社交观念与行为模式。在流动社会的背景下,Z世代的社交关系面临着稳定性缺失的问题,“倦怠制造了一个允许逗留的闲适空间”<sup>[35]</sup>，“零糖社交”成为他们重构社交关系、适应社会变化的主动选择。第一,人口流动的常态化让Z世代的社交关系呈现出流动性强、稳定性弱的特征。与前代人工作稳定、生活圈子固定不同,Z世代更倾向于追求职业发展的自主性,跨城市就业、频繁更换工作成为常态。这种持续的空间流动,使得他们的社交圈子不断重构,许多基于地域、工作建立的社交关系难以长期维系。在这种情况下,Z世代逐渐意识到,依赖外部环境建立的功利

性社交往往不堪一击,只有基于情感共鸣、价值观契合的纯粹社交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零糖社交”所摒弃的利益捆绑式社交,正是他们对流动社会中社交关系不稳定性的一种回应,通过剥离社交中的“功利糖衣”,建立以情感为核心的稳定关系,从而在流动的生活中获得情感上的归属感。第二,社会竞争的激烈也让Z世代的社交逐渐回归实用性与情感性的平衡。在教育、就业、职场等领域的激烈竞争中,Z世代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与发展压力,他们需要将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到自我提升中,没有多余的精力维系无效社交。对于Z世代而言,社交不再是广撒网式的人脉积累,而是精准筛选后的情感滋养与价值同频。那些能够在压力下提供情感支持、在成长中给予正向能量的高质量社交,才是他们需要的。而那些单纯为了拓展人脉、撑场面的应酬式社交,则被他们果断摒弃。“零糖社交”所倡导的无负担社交,本质上是Z世代在竞争压力下的主动选择——通过精简社交圈子,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对自身情感与成长有正向价值的关系中,实现社交与自我发展的良性互动。第三,生活节奏的加快让Z世代的社交更追求去形式化的高效与纯粹。在“内卷”成为常态的当下,Z世代的生活被工作、学习、自我提升等填满,碎片化社交成为他们社交的主要方式。传统社交中那些流程繁琐、耗时较长的形式主义应酬,难以适配他们的生活节奏。“零糖社交”所呈现的轻量化、去形式化特征,恰好契合了他们对高效社交的需求。这种社交模式,是Z世代在快节奏生活中重构社交关系的理性选择,通过摒弃冗余的流程与套路,直接实现情感交流,让社交回归沟通本身。

### 三、Z世代“零糖社交”的引导路径

#### (一) 引导青年树立适度零糖的理性社交观念

“价值观是对何为重要之物的更深层面的信念,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影响极大”<sup>[4]175</sup>。价值观念是个体行为的先导,Z世代对“零糖社交”的践行偏差,本质上源于对这一社交模式的认知误区。因此,要走出认知误区,树立适度零糖的科学社交观念,避免走向“绝对零糖”或“形式零糖”的极端。第一,学校作为思想引领主阵地,可将社交价值教育融入通识教育,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形式,帮助Z世代辨析无效社交与必要社交的边界,既不鼓励为迎合他人而进行的情感内耗,也不倡导因畏惧麻烦而拒绝所有潜在连接。例如,通过职场社交模拟、校园社团协作等实践活动,让Z世代在真实互动中体会到,适度零糖不是封闭自我,而是在保持自我边界的同时,保留开放的社交态度。第二,家庭应摒弃人脉决定论的功利化社交观念,发挥社交启蒙的基础作用。“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sup>[1]133</sup>,也是个体社交观念形成的最初场域。家长应充分尊重Z世代的自主社交选择,同时引导其理解社交的多元价值,通过日常相处传递真诚为基、质量为先的社交理念。比如在家庭聚会等场景中,鼓励孩子表达自身真实想法,而非强迫其进行礼貌应酬,让Z世代在潜移默化中明白,“零糖社交”的本质是质优于量,是摒弃功利化的社交捆绑,而非完全割裂人际交流、拒绝正常的情感互动。第三,媒体应发挥正向舆论引导作用,通过短视频、深度专栏、话题讨论等Z世代易于接受的形式,宣传适度零糖的正向典型案例,纠偏对“零糖社交”的极端化解读。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5]501</sup>,这意味着完全拒斥社交、封闭自我,违背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因此,媒体应避免过度渲染“孤独至上”“躺平社交”等极端论调,传递纯粹且开放、独立且包容的社交价值观。同时,要警惕“零糖社交”可能衍生的利己主义倾向,引导Z世代在关注自我感受的同时,兼顾他人情感与社会责任。例如,可深度报道志愿服务、社区共建等场景中的正向社交案例,让Z世代在利他行为的叙事中体会社交的温度,理解“零糖”是摒弃功利纠缠与形式内耗,而非否定社交的互助属性与情感价值,从而树立自我与他人共生共赢的科学社交观念。

## (二)营造包容开放的良好社交生态环境

“社会的变迁导致了人类心理内部的转化”<sup>[3]55</sup>。流动现代性下的社会转型,不仅催生了Z世代对“零糖社交”的内在需求,也伴随着功利化的社交风气、数字化带来的社交异化,以及对不同社交方式的包容度不足等问题,制约着“零糖社交”的发展。为此,需从学校、社会、网络平台等着手,构建包容开放、去功利化的良性社交生态。第一,学校应打造多元化、去标签化的社交平台,搭建“零糖社交”的校园实践载体。校园社交不应以成绩、身份为标签,而应鼓励学生基于兴趣、理想自由联结。学校可设立跨学科社团、创新实践小组等,为不同性格、不同特长的学生提供低门槛、无压力的社交渠道。此外,学校应建立健全心理咨询与社交支持机制,对遭遇社交困境、社交焦虑的学生及时给予专业帮扶,包容内向型、边界感强等多元社交方式,让校园成为践行“零糖社交”的安全区。第二,社会层面应倡导去功利化的社交风气,营造包容多元的社交环境。要摒弃“应酬多=情商高、人脉

广=能力强”的单一社交评价体系,引导全社会树立健康多元的社交观,为Z世代践行“零糖社交”营造优良环境。同时,社会应充分尊重Z世代“零糖社交”的行为逻辑,不将坚守社交边界等同于高冷孤僻,不将拒绝无效应酬等同于不合群,不将线上浅联结、线下深交互的模式等同于社交封闭,以包容的心态接纳多元化的社交选择。第三,网络平台应承担主体责任,打造健康纯粹的数字化社交空间。线上场景是Z世代社交的主要阵地,但算法推荐导致的“信息茧房”、网络匿名性催生的语言暴力、流量至上引发的表演式社交等,都在持续侵蚀“零糖社交”的纯粹性。网络平台应主动优化算法机制,弱化流量、粉丝量级、人设包装的社交权重,减少功利化、娱乐化的社交内容推送,打破算法对用户社交选择的操控,为用户提供基于兴趣、真实表达的自主匹配渠道。同时,可推出更多鼓励真诚互动、深度联结的功能设计,引导Z世代将网络社交从“流量联结”转化为“情感联结”。

## (三)培育青年精准联结的社交素养

“零糖社交”的本质是去掉冗余、摒弃讨好、回归真诚的高质量主动社交,而非消极回避、被动封闭的“躺平式社交”。它需要Z世代具备清晰的自我认知、良好的边界意识与高效的沟通能力,这样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维系健康持久的社交关系。“一个人成长成才,内因起决定作用”<sup>[1]40</sup>,社交能力的系统培育,是引导Z世代理性践行“零糖社交”的重要路径。第一,培养清晰的自我认知能力。“零糖社交”的前提是明确我是谁、我需要什么样的社交。部分Z世代在社交中陷入迷茫,要么盲目迎合他人,要么刻意疏远所有人,根源在于自我认知模糊。对此,应引导Z世代通过自我反思、

兴趣探索、实践体验等多元路径,明确自身的价值取向、性格特质与社交需求,并建立稳定的内在价值评价体系,使其在社交中始终坚守自我,避免随波逐流的无效社交。第二,树立明确的边界意识。清晰的边界意识是维持社交舒适感、平衡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关键。部分 Z 世代在社交中陷入两个极端:一是边界感缺失,习惯性迎合他人、不敢拒绝,在过度满足他人需求中陷入自我消耗;二是边界感过强,以“零糖”为名封闭自我,将他人的善意与联结需求一概拒之门外。为此,需加强对 Z 世代边界意识的培育。一方面,引导其清晰界定社交中的物理边界与心理边界,明确自身在社交中的可接受范围与底线原则。另一方面,培养其掌握维护个人边界的技巧,既能坚定拒绝不合理诉求、守护自身边界,也能以恰当的方式接纳善意、开放联结,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第三,提升沟通能力。“零糖社交”并非“沉默社交”,真诚且高效的双向沟通,对实现精准联结至关重要。当前部分 Z 世代习惯于线上碎片化交流,线下面对面的表达与共情能力存在明显短板,要么存在面对面社交表达障碍,要么沟通方

式过于直接,忽略他人的情绪感受,直接影响社交质量。对此,需系统强化 Z 世代的双向沟通能力,可通过角色扮演、社交场景模拟等实操性训练,教会其如何清晰表达自己的需求、如何倾听他人的想法、如何化解社交矛盾。同时,要“善于把线上互动和线下沟通结合起来”<sup>[11]57</sup>,引导 Z 世代掌握线上线下融合的沟通技巧,让高效沟通真正成为实现精准联结的桥梁。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2] 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現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3] 韩炳哲.倦怠社会[M].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4] 伊莲·福克斯.应对力[M].王保令,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徐书琴



(上接第 16 页)

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建构逻辑与理论贡献[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9.  
[2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1] 周晓宇.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及实践路径[J].学术探索,2024(12):16-23.  
[22] 张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

命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鲜明特质及实践进路[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5(4):24-33.  
[23] 习近平.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五个进一步到位”[J].求是,2025(23):4-8.  
[2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责任编辑:马俊

#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合路径研究 ——以河南省三门峡市为例

李小凤

(三门峡市委党校,河南 三门峡 472511)

**[摘要]**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鲜活的地域注脚和深厚的精神滋养。二者融合有利于提升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助力经济发展。三门峡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拥有仰韶文化、虢国文化等诸多传统文化资源。推动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需加强保护工作,深化研究阐释;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滋养时代新人;利用各种传播手段,提升宣传效能;融入生产生活实践,推动知行合一。

**[关键词]**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门峡市 融合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三门峡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地处黄河流域中

游、连接中原与西北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得华夏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拥有仰韶文化、虢国文化等诸多传统文化资源。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构成了三门峡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文化优势,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鲜活的地域注脚和深厚的精神滋养。推进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方文化根基、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具

---

收稿日期:2026-01-21

作者简介:李小凤,中共三门峡市委党校统战理论政策教研部讲师。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相关思想与实践。

富强。三门峡是仰韶文化发现地和核心区。仰韶先民过着定居生活,擅长制作彩陶,展现了早期社会对生产发展和物质丰富的不懈追求。西周时,虢国作为王室屏藩和军事强国,拥有发达的青铜冶铸业。虢季墓出土的玉柄铜芯铁剑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被誉为“中华第一剑”<sup>[1][174]</sup>,展现了古代虢国对国力强盛、技术进步的极致追求。古代陕州地区作为连接关中与中原的漕运枢纽和战略要冲,其繁荣的商贸与军事活动,亦是古代社会追求富国强兵、实现区域繁荣的生动体现。

民主。灵宝西坡遗址 F105 占地 516 平方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带回廊的古典建筑,也是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建筑遗址,具有原始宫殿性质,被称为黄帝时期的“人民大会堂”。这个“大房子”位于聚落中心区域,建筑结构考究,有夯土地基、防火涂层等,显示其特殊地位。考古学界普遍认为,“大房子”并非居住场所,而是集体活动空间。仰韶文化中期社会分化尚不明显,部落成员可能通过集体讨论决定公共事务,这体现了原始民主的共同协商特征。

文明。仰韶村遗址、庙底沟遗址、北阳平遗址群是三门峡“早期中国”文明长廊的突出坐标,确立了三门峡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重要地位。渑池仰韶村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被誉为“中国考古

圣地,华夏文明源头”。庙底沟时期是仰韶文化的鼎盛期。庙底沟彩陶影响范围北抵阴山、南至长江、东到大海、西达甘青,它的广泛传播事实上掀起了中国史前时代第一次艺术浪潮。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先生认为:“最早的‘中国’,应该说就是从三门峡地区走出去的。”<sup>[2]</sup>灵宝北阳平遗址群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中规模最大、遗址等级最高的聚落遗址群。西坡遗址被列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六大首选遗址”<sup>[3]</sup>。

和谐。老子在函谷关著《道德经》,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第一,人与自我和谐。老子强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认为人要保持朴素本性,减少私欲,才能达到身心和谐。第二,人与社会和谐。老子提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人在社会中要有水一样的美德,以谦和的态度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第三,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类与天地万物同根同源,道、天、地、人同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只是其中之一。因此,面对自然,人要顺应天道,心怀敬畏与自然和谐相处。

(二)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这些价值观在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中也有所体现。

自由。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由”,包括了哲学智慧、民间传说和民众生活中的多种表达。在哲学智慧上,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强调个体通过修身养性超越名利、物欲的束缚,达到心灵的宁静与

空明,这是一种指向精神境界的自由。在民间传说中,大禹治水,用神斧将高山劈成“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三门峡由此得名,蕴含着人类突破自然束缚、追求生存自由的强烈渴望。在民众生活中,灵宝阳平镇的东常村和西常村数千年来流传一种特殊的“骂社火”习俗。令人称奇的是,社火中骂人不会得罪人,挨骂者还将被骂当成一种荣誉,因为被骂者一般都是本村的村干部或者有能力有威望的人。群众通过“骂社火”的活动跟不良风气、丑恶现象作斗争,让春节成为群众精神自由表达的一次狂欢,也成就了村民们的一道文化大餐<sup>[4][154]</sup>。

平等。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平等观念体现的是一种朴素的公平、均衡和众生皆有价值的思想。在社会结构上,从庙底沟等仰韶文化遗址来看,当时是典型的原始氏族社会。土地等生产资料归氏族集体所有,成员共同劳动、共享成果。随葬品简单且差别不大,表明当时社会尚未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氏族成员之间经济、社会地位相对平等。在哲学思想上,老子提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认为天地(自然法则)对万物一视同仁,没有偏私,蕴含着普遍平等思想。他主张“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天之道”,为追求社会平等和谐提供了独特的哲学视角。

公正。“公正”是深植于三门峡历史文化土壤中的重要伦理观念。西周时期,召公奭治理陕地(今三门峡一带)。他巡行乡邑时,常在甘棠树下听讼决狱。他推行德政,公正处事,使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都能各得其所。人们怀念召公,对他憩息过的甘棠树也爱护有加,作《诗经·召南·甘棠》以示纪念。

民间故事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公正和清廉政治的渴望。如《晋书·列女传》中记述了一个“陕妇人蒙受奇冤”的故事。该女子被冤杀后,“时有群鸟悲鸣尸上,其声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为虫兽所败,其境乃经岁不雨。”<sup>[15][2512]</sup>。后来,关汉卿以该妇人为原型创作了《窦娥冤》。

法治。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道”应该效法自然。同时,他提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批判那些繁琐严苛、违背“道”的“恶法”。他认为好的治理(法治)应是“无为而治”,而不是用繁苛的律令去扰民。这体现了对法律本质和目的的深刻思考。

(三)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关乎社会的道德根基。这些美德也体现在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中。

爱国。西周、春秋时期战争频繁。位于东西交通要道上的虢国肩负着护卫周王室、奉命征讨不庭的重任。据统计,虢国墓地共发掘出土车马坑9座、马坑3座,总计有67辆车、182匹马<sup>[11][180]</sup>。虢国车马坑展现了虢国的强大国力,更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爱国精神的体现。陕州人姚崇为唐代著名政治家,他提出《十事要说》,辅佐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面对“天灾不可抗”的保守言论,他坚持科学灭蝗,护国安民,其治国理念蕴含了深厚的爱国忧民情怀。渑池阳壶人张伯玉与其子张世雄,同为南宋名将,一门双烈,为抗金血染疆场。他们的爱国精神体现在捍卫国家主权、推动社会进步、增进民生福祉的实践中,成为这片土地永远的骄傲。

敬业。千百年来,三门峡地区无数能工巧匠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创造出无数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虢国的工匠将玉、铜、铁三种质地、硬度、制作工艺不同的材料有机结合,采用套接、镶嵌、熔铸等技术,制成“中华第一剑”玉柄铜芯铁剑,展现了古代虢国工匠的高超技术水平和敬业精神<sup>[1]175</sup>。虢州黄河澄泥印,是陶印中的极品,被誉为“黄河文化之魂”<sup>[4]86</sup>。澄泥砚观之如墨玉、击音如钟鸣,质朴浪漫,坚实如铁,与端砚、歙砚、洮砚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砚”<sup>[4]92</sup>。

诚信。老子提出“言善信”,即说话要守信。并从反面告诫人们,“轻诺必寡信”,提醒人们轻易许诺必定很少守信,因此要慎重承诺,避免失信。“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他主张无论别人是否守信,我都要以诚信待之,这样才能培养诚信之风。这是一种超越功利算计的诚信。虢国的历史与“信”、“不信”的政治博弈紧密相连。成语“唇亡齿寒”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虞国国君因贪图小利,允许晋国军队借道去攻打虢国,最终导致虢、虞两国相继被灭。一次背信弃义的选择,直接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友善。“友善”强调公民之间互相关心,和睦相处。南沟村剪纸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该村剪纸有三绝:第一绝是技艺传男不传女;第二绝是剪纸颜色崇尚黑色;第三绝是边剪纸边唱歌。一般来说,剪纸技艺的主要传承方式是家族式传承,但南沟村先是在男人们中相互流传,后是男女老少都参与进来。目前,村中500多户人家,有200多户从事剪纸及相关行业,南沟村也被誉为“中国剪纸第一村”<sup>[4]84</sup>。南沟村剪纸艺术的蓬勃发展生动展现了守望相助、与邻为善的民风。

## 二、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价值

### (一)提升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

将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是推动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新生、实现其内在价值的关键环节。第一,可以激活文化资源。通过对三门峡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深度挖掘,能有效激活沉睡的文化资源,使其转化为推动地方发展的文化资本、教育资源和精神动力。第二,可以促进文化创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过滤掉三门峡传统文化中某些封建糟粕,弘扬那些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文化精华,如老子的和谐智慧、虢国文化中的工匠精神等。第三,可以激发文化自信。融合工作可以增强民众对本地文化的自豪感与归属感,从而自觉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实现从文化认知到文化认同,再到文化自信的升华。

### (二)提供丰厚土壤,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需要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三门峡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丰厚土壤。第一,提供丰富素材。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故事、戏剧、谚语等,极大增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染力与说服力,使其更易于被民众理解、记忆和践行。第二,提供实践载体。三门峡独特的文化遗址、历史故事与民俗活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提供了多样化的现实载体。民众在身临其境的文化体验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熏陶,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和传播者。第三,提供群众基础。本地民众对仰韶文化、老子文化等怀有天然的亲近感与自豪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这些地方文化符号绑定,能够有效激发民众基于乡土情怀的认同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深厚的群众基础。

### (三)推动文旅融合,助力经济发展

对三门峡而言,传统文化是“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魂”,文旅融合是“桥”,经济发展是“果”。推动四者深度融合,有利于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高质量发展。第一,丰富文旅产品的精神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为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提供价值导向。如依托黄河文化、老子“道法自然”思想,打造生态康养、黄河生态文明研学线路,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融入生态文旅。第二,创新文旅业态,延伸价值链。推动文旅从“观光式”向“体验式”“沉浸式”转型。鼓励文化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秉持敬业精神,创作文化精品,提升文旅附加值。第三,驱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以“文化+旅游”为核心,带动农业(如灵宝苹果文化节)、数字产业(VR 考古体验)等融合发展,促进产业联动,形成产业集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地方文化符号结合,通过“黄河明珠·道德之源”等城市形象定位,实现城市品牌增值,吸引投资与人才。

## 三、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路径

### (一)加强保护工作,深化研究阐释

1.加强保护,夯实融合基础。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包括历史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与传统工艺等,受外部环境与自身因素的影响,部分遭到破坏,有些逐渐

失传。比如虢国墓地曾在1989年、2000年两次遭遇大规模盗掘,造成了虢国文物的重大损失。在民间表演中,发源于古陕州的扬高戏、流行于豫晋陕的锣鼓书、被誉为“电影鼻祖”的灵宝道情皮影等,随着演出市场萎缩和老艺人相继谢世,也面临后继乏人、生存困难的窘境,甚至濒临失传。一方面,政府要采取针对性举措,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另一方面,民间艺人也要加强创新意识,创作出符合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2.深入阐释,搭建研究平台。当前,三门峡许多珍贵的文化资源散见于出土文物、历史典籍、民间传说中。为系统整理三门峡文化资源,三门峡市委、市政府曾在2020年精心组织编纂了大型文化丛书——《文化三门峡》,内容涵盖《禅宗文化》《民间文化》《虢国文化》等八个方面。但这些研究成果往往作为学术资料被束之高阁。三门峡文化资源的整理研究工作还有待继续深入,可整合本地社科联、党校、高校的研究力量,主动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南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组织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等跨学科团队,对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机理、时代内涵等进行系统化、学理化的研究,产出系列高质量学术论文、专著和决策咨询报告,为融合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 (二)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滋养时代新人

1.系统融入教材课程体系。组织专家编写覆盖中小学各学段、具有三门峡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辅助教材和传统文化读本。将召公故事、老子格言、仰韶考古发现等内容,通过案例分析、经典诵读、专题模块等形式,有机融入中小学德育、语

文、历史等课程教学与校本课程开发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2.创新实践育人模式。广泛开展“《道德经》诵读与感悟大赛”“仰韶彩陶我来绘”手工实践等主题研学实践活动。高标准建设一批国家级、省级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如庙底沟考古研学基地、函谷关道家文化研学基地等,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熏陶,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三)利用各种传播手段,提升宣传效能

1.充分利用传统媒体。通过图书出版、报纸专栏文章、专题报道等,分析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剖析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之处。利用电视、广播媒体,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参与制作专题节目或纪录片,进一步提高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平台。通过微信文章、短视频等形式将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以更加轻松、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公众。如以短视频方式展现南沟村黑色剪纸,结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读,更加直观、易于理解。综合运用多种媒体手段,可以激发公众对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将融合理念有效传达给公众,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与深度融合。

(四)融入生产生活实践,推动知行合一

1.融入城乡文化建设。在城市规划、公园建设、社区改造、乡村振兴实践中,有机融入三门峡文化符号和核心价值观主题。在公共空间设计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公益广告、城市雕塑、景观小品、文化墙绘等,打造集文化展示与价值传导于一体的城市客厅、文化街区,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可感可知。

2.融入节庆活动。传统节日和重大活动是宣传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契机。通过举办各种纪念活动,在富有仪式感的活动中增强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凝聚社会共识。如通过在黄帝铸鼎原祭祖大典中安排乐舞敬拜和祈福仪式,祈望国泰民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利用仰韶文化节、老子诞辰纪念日开展仰韶文化论坛、《道德经》经典诵读活动,展现三门峡深厚文化底蕴,增强民众文化自信,传播主流价值观。

#### 四、结语

推动三门峡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将持续激发本土文化的内生动力与时代光彩,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三门峡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扎根更深、影响更广,为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门峡篇章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 参考文献:

- [1] 毋慧芳,梅良川.虢国文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20.
- [2] 中华文明探源的三门峡实证[EB/OL].(2022-07-07)[2026-01-09].<https://www.henan.gov.cn/2022/07-07/2483117.html>.
- [3] 李小凤.三门峡市加强仰韶文化资源挖掘与利用的对策建议[J].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5(1):103-106.
- [4] 孟国栋.民间文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20.
- [5] 《晋书》卷九十六·列传第六十六·陕妇人[M].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徐书琴

# 列宁在俄国城乡关系问题上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审视

魏志达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列宁对俄国城乡关系中资本主义要素展开的辩证审视,不仅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为理解落后国家城乡对立的起源与本质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列宁立足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结合俄国具体实际,对资本主义在俄国城乡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开展了系统分析,其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推动农村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并加速城乡分离;资本逐利本性驱使城市对农村的资源攫取与生态破坏;资本主义加剧农村阶级分化并引发城乡人口单向流动。列宁在俄国城乡关系问题上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审视具有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价值,可为理解全球资本主义下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批判依据,尤其是在当前城乡发展仍存在不平衡问题的形势下,这一辩证审视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关键词]**列宁 城乡关系 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sup>[1]38</sup>。在 2025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sup>[2]</sup>。构建新

型城乡关系不仅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更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必须把握的基础性、全局性课题。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列宁在俄国城乡关系问题上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审视,是其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基础,

基金项目:2024 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建设研究”(立项编号:FJ2024XZB063)。

收稿日期:2026-01-12

作者简介:魏志达,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结合俄国具体实际情况,对资本主义在俄国城乡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开展了系统性分析,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资本主义持不同的具体观点,有对资本主义肯定的观点,也有否定的观点”<sup>[3]</sup>。可见,列宁在俄国城乡关系问题上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审视,始终坚持历史性、具体性与阶级性的分析方法,避免将城乡关系问题简单化为技术或管理问题。列宁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审视路径,对于当下分析城市化、乡村振兴等重要问题而言,仍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指导价值,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反思城乡融合发展路径,探索更加公正、可持续的社会空间组织方式。

### 一、资本主义推动农村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并加速城乡分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将封闭的农村自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运行轨道,打破了城乡原初共生关系,从根本上加速了城乡之间的分离进程。

#### (一) 资本主义专业化生产瓦解农村经济完整性并确立城乡产业分工

农村自然经济的特质在于生产环节的自足性与经济形态的完整性,而资本主义专业化生产以社会分工为内核,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一传统格局,成为城乡关系转型的逻辑起点。列宁指出,自然经济下的农村经济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sup>[47]</sup>,形成了自给自足、无所不包的完整性特征,其生产活动不依赖外部交换,也未形成明确的产业分化。资本主义则以社会分工为商品经济的基础,推动“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分离开来,它们各自再分为一些小的和更小的部门”<sup>[46]</sup>,这一专业化生产不仅让工业部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更将

农业本身改造为“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sup>[47]</sup>。农村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消费封闭体系,而是出现了“日益专业化的种种农业区域(和农业系统)”<sup>[47-8]</sup>,专注于特定农产品的商品生产,使得原本完整的农业生产被拆分为独立的专业化环节,传统农村经济的自足性与完整性被彻底瓦解。

资本主义专业化生产在瓦解农村经济完整性的同时,通过生产要素的集中与产业功能的分化,确立了城乡之间工业集中与农业专业的产业分工格局。列宁指出,资本主义“造成了空前未有的生产集中以代替过去的生产分散”<sup>[44]</sup>,这一集中性在城乡关系中体现为工业生产向城市聚集,形成大工业中心,而农村则聚焦于专业化农业生产。一方面,专业化工业部门脱离农村后,在城市形成规模化生产体系,承担起商品加工、生产技术革新等功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农村放弃了传统的手工业等加工环节,转向商业性农业,其生产不再以满足自身消费为目标,而是为城市工业与市场提供农产品原料,形成了农业提供原料、城市工业加工、商品市场流通的分工格局。这一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必然体现,即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要求工业集中以提升效率,而农业专业化则为工业提供稳定的原料供给,城乡产业分工由此确立。

资本主义专业化生产所确立的城乡产业分工,进一步重塑了城乡关系的本质,使城乡从自然经济下的孤立并存转向商品经济下的依赖共生,但其共生基础始终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在自然经济时代,城乡之间缺乏实质性的产业关联,然而,在资本主义专业化生产推动下,社会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

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sup>[47]</sup>,农村的专业化农产品与城市的工业制成品通过商品交换形成了紧密联系。同时,这一分工伴随着农业人口减少与工业人口增加的人口流动趋势,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引不仅强化了工业生产的集中性,更使城乡产业分工获得了人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城乡产业分工并非平等的城乡功能互补,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结构性安排,即城市工业凭借技术、资本优势掌握分工主导权,农村则沦为原料供给地,城乡关系由此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为后续城乡分离的深化奠定了产业基础。

## (二) 资本主义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市场网络支配农村交换体系

自然经济时代的城乡交换呈现分散、封闭的碎片化特征,而资本主义以商品流通为纽带,打破了农村小经济单位的孤立性,构建起以城市为中心的统一市场网络,从空间与结构上重塑了城乡交换格局。列宁明确指出,“商品生产的增长本身破坏自然经济所固有的小经济单位的分散性,并把小的地方市场结合成为广大的国内市场(然后结合成为世界市场)”<sup>[44]</sup>。前资本主义时期,农村交换局限于村庄或附近小市场的狭小范围,城乡之间缺乏实质性的商品流通,但资本主义生产“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以至国家的界限”<sup>[45]</sup>,工业生产在城市的集中使其天然成为商品流通的枢纽。城市聚集了资本、技术与工业制成品,既需要农村提供农产品原料,又为农村提供消费所需的工业商品,自然成为商品市场网络的中心。可见,这一从小市场到统一市场的跃升,本质上是城市对农村交换空间的主导性重构,使城乡交换从孤立并存转向以城市为中心的格局。

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市场网络,通过确立经济主导权,实现了对农村交换体系的深层支配,使农村交换从自给自足的自主形态转向依附城市的被动形态。列宁指出,“获得货币的需要,使得自然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转化”<sup>[45]</sup>,货币权力不仅压迫着农民,更迫使农村生产体系纳入城市主导的市场规则。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农村生产不再以满足自身消费为目标,而是围绕城市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化生产,“每一个地区,运往市场的主要是某一种产品”<sup>[45]</sup>,农产品的流通方向、交换价格均由城市市场的供需关系与资本逻辑决定。“资本主义现代化是资本驱动下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各种类型的产业在组织形态、产出水平、技术支撑等方面的飞跃,代表着生产力的进步”<sup>[5]</sup>,农村与城市的交换不再是平等的产品互通,而是农村作为原料供给地,通过交换获取城市工业制成品的依附性交换。因而,城市掌握着商品交换的定价权、流通渠道控制权,农村交换体系失去了自然经济时代的自主性,彻底沦为城市市场网络的附属环节。

城市主导的商品市场网络对农村交换体系的支配,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之间的结构性依附关系,推动城乡分离从经济形态向社会形态深化。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增加大工业中心数目”<sup>[44]</sup>,而工业中心的形成必然吸引农村人口与资源向城市聚集,强化城市在市场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农村交换体系的依附性,本质上是城乡产业分工与经济权力失衡的体现,即城市凭借工业集中、资本聚集的优势,成为商品经济的规则制定者与利益分配者,而农村因产业单一、资本匮乏,只能在交换中处于被动接受地位。这一支配性交换关系不仅使农村的

经济剩余通过商品流通向城市转移,更让农村的生产决策、资源配置完全服从于城市市场需求,城乡之间不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而是形成城市支配与农村依附的不平等交换格局。这一以市场网络为纽带的支配关系,成为资本主义加速城乡分离的重要经济形态,推动城乡在发展水平、社会结构上的差距逐渐扩大。

(三) 资本主义大工业布局进一步重塑了城乡空间结构与人口分布

自然经济时代的城乡空间呈现分散、孤立的均衡格局,而资本主义大工业以集中化布局为特征,打破了传统城乡空间的封闭性,构建起以工业中心为枢纽的新型城乡空间体系,从根本上重塑了城乡空间关系。列宁明确指出,前资本主义时期人们“定居在乡村,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不是为了自己消费,就是为了附近村落的小市场”<sup>[65]</sup>,城乡之间缺乏实质性的空间关联。然而,资本主义大工业“日益迅速地发展起来”<sup>[61]</sup>,通过工厂集群化布局形成大工业中心,这些工业中心并非分散于农村,而是集中于城市或工业村镇,成为承载大规模商品生产的空间载体。大工业的集中布局不仅推动了城市的扩张与工业村镇的兴起,更打破了农村的空间孤立状态。铁路等交通设施因工业运输需求而延伸,将城市工业中心与农村原料产地、消费市场连接起来,促使城乡空间由孤立并存的状态转变为中心辐射的结构,进而使城市确立起对城乡空间秩序的主导地位。

资本主义大工业布局通过引发大规模人口流动,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人口主导的城乡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列宁援引马克思的《资本论》指出,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农业人口同非农

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sup>[49]</sup>,这一规律的直接驱动力正是大工业的集中布局,大工厂“使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相继破产,把他们变成一无所有的工人,把越来越多的人赶进城市、工厂和工业村镇”<sup>[61]</sup>。自然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人口依附于土地,农业人口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然而,大工业的集中生产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其在城市的集聚形成了强大的人口虹吸效应,迫使破产农民“抛弃了自己的小块份地”<sup>[66]</sup>,脱离农业与乡村,涌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这一人口流动表现为规模化、持续性的群体转移,既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充足劳动力,又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农村人口占比持续下降,城乡人口分布从均衡、分散转向失衡、分化,进一步固化了城乡空间的差异化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布局对城乡空间与人口分布的重塑,本质上是通过空间与人口的联动性重构,强化了城乡之间的依附关系,推动城乡分离从经济形态向空间形态深化。列宁指出,工业中心的形成与人口集聚“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极深远的影响,不能不引起商业性的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的发展”<sup>[49]</sup>。在大工业布局主导下,城市成为资本、技术、劳动力的集聚地,承担着商品生产、流通的核心功能,而农村则沦为城市工业的原料供给地与劳动力储备库,其空间价值与人口流动均服从于城市工业的发展需求。农村人口的持续外流导致农村传统生产体系逐渐瓦解,迫使农业向商业性、资本主义农业转型,以适应城市工业的原料需求,而城市则凭借人口与产业的集聚优势,在城乡空间竞争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一由大工业布局引发的空间与人口重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的城乡关系重构,即城乡

之间不再是相对独立的空间单元,而是形成城市支配农村、农村依附城市的不平等空间关系,城乡分离在空间与人口维度被彻底固化。

## 二、资本逐利本性驱使城市对农村的资源攫取与生态破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利本质,促使城市对农村展开单向度资源攫取,既加剧了城乡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又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的生态破坏。

(一) 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切断城乡间物质循环导致“不正常的新陈代谢”

自然经济时代的城乡关系以物质循环为重要特征,农村与城市通过双向物质流动形成良性代谢,从而维系着城乡生产与生态的平衡。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农村作为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体,农产品加工废弃物、人畜粪便等自然养分可直接回归土地,实现索取与归还的物质循环。同时,城市作为有限的消费中心,其消费废弃物也能通过简单渠道回流农村,补充农村土地肥力,形成城乡间相互依存的物质循环。在这一循环模式下,城乡关系并非孤立的生态单元,而是通过物质流动构成有机整体,农村的土地生产力得以自然维系,城乡生态关系处于相对均衡状态。

然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以城市集中布局为载体,通过改变人口分布与生产方式,彻底切断了城乡间的良性物质循环,催生了“不正常的新陈代谢”<sup>[4]56-57</sup>。“帝国主义的世界性殖民意味着分配‘一小撮人’的资源占有权,其向全球推行的异化的生产方式、分配模式与消费结构只会导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矛盾不断加深。”<sup>[7]</sup>列宁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导致“人口集中于城市,使土地无人耕种,并且造成了不正常的新

陈代谢”<sup>[4]56-57</sup>。大工业在城市的集聚吸引大量农村人口脱离土地涌入城市,一方面,使农村劳动力锐减,“土地的耕作没有得到改善,或者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sup>[4]57</sup>,传统农业的物质循环能力被削弱;另一方面,城市工业生产与消费形成独立体系,其产生的生活废弃物等不再回流农村,而是以污染物形式堆积,打破了自然经济下的物质回流状态。同时,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农村沦为城市工业的原料供给地,农产品被大量运往城市消费,但其蕴含的养分却无法通过有效途径回归农村土地,导致农村“土地的生产力受到掠夺”<sup>[4]56</sup>,形成了索取多、归还少的单向物质流动,城乡物质循环的流通过程基本断裂。

可见,这一“不正常的新陈代谢”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城乡剥削关系在生态层面的延伸,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之间城市攫取与农村受损的不平等格局。列宁强调,资本主义“破坏了土地经营和土地肥力之间的平衡(由于城市同农村的分离)”<sup>[4]57</sup>,而这一平衡的破坏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逐利本质,即城市工业与商业性农业均以资本增殖为目标,忽视了物质循环的生态逻辑。农村为城市持续提供农产品原料与劳动力,却无法获得城市的物质养分补偿,只能依赖人造肥料与厩肥维持生产力,但“在现有的耕作制度下,这一点是办不到的”<sup>[4]57</sup>,导致土地肥力持续衰退。城市则通过单向物质攫取实现工业扩张,却将生态代价转嫁给农村,使农村沦为城市发展的“生态附庸”。这一被切断的物质循环,不仅加剧了农村生态的脆弱性,更使城乡关系从自然经济下的生态共生,异化为资本主义下的生态剥削,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分离的结构性矛盾。

(二) 资本主义大工业对农村劳动力的

吸纳致使农村人力资源枯竭

自然经济时代的农村人力资源呈现稳定封闭特征,劳动力与土地深度捆绑,形成以小业主、农民为中心的自给自足劳动力体系,维系着农村生产与生活的内在平衡,构成传统城乡关系的人力基础。列宁认为,前资本主义时期“几乎全部财富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业主生产的”<sup>[65]</sup>,农民定居于乡村,手艺人或居于乡村或在附近揽活,劳动力流动局限于狭小地域,未脱离农村经济体系。在这一劳动力格局下,农村人力资源自给自足,既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又支撑着乡村手工业等附属产业,使农村成为相对独立的人力供给单元,城乡之间未形成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城乡人力配置处于静态均衡状态。

然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崛起以打破农村劳动力稳定格局为前提,通过产业替代与生存挤压,形成了强大的人力吸纳效应,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中心大规模、持续性外流。列宁明确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小手工业作坊开始被飞快发展起来的大工厂所代替”<sup>[65]</sup>,并通过残酷的市场竞争“排挤了小业主,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sup>[65]</sup>。农民解放后,小块土地已无法维持生计,定居生活被彻底打破,为了谋求生存,大量农民“出外谋生,有的进工厂,有的修铁路”<sup>[65]</sup>,“许多人进城谋生”<sup>[66]</sup>,还有部分农民在家承接商人和厂主的活计,本质上都已脱离了传统农业生产体系。大工业中心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与农村小生产破产后的生存危机形成双向驱动,使劳动力流动从偶然现象演变为必然趋势,农村劳动力以“无产者”身份向城市聚集,农村人力资源开始持续性流失。

农村劳动力的规模化外流最终导致其

人力资源枯竭,这一枯竭不仅是数量上的锐减,更表现为结构上的失衡,进而重塑了城乡人力配置的不平等关系,深化了城乡分离。列宁指出,“越来越多的人完全脱离了乡村,脱离了农业,聚集到城市,聚集到工厂和工业村镇”<sup>[66]</sup>,形成专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这一流失是农村核心劳动力的整体性转移。青壮年劳动力、有技能的手艺人成为流动主体,留下的多为缺乏生产能力的弱势群体,导致农村土地无人耕种或耕作水平下降,小生产因缺乏人力支撑而加速瓦解。同时,城市工业中心凭借人力聚集实现了规模扩张,农村则因人力资源枯竭丧失自主发展能力,沦为城市的“劳动力储备库”。城乡关系由此从传统的人力静态均衡异化为城市吸纳与农村供给的单向依附关系。人力资源的枯竭不仅削弱了农村的生产活力,还加剧了城乡发展失衡,使城乡分离在人力层面形成不可逆的结构性矛盾。

(三) 资本主义商品农业迎合城市需求引发农村土地的掠夺式经营

自然经济时代的农村土地经营以自给自足为重要特征,土地肥力养护与生产安排遵循自然规律,形成耕种与休养的良性循环,城乡之间未形成土地经营的主导与依附关系。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农民与地主的生产“主要是为了自己消费”<sup>[65]</sup>,土地经营以满足自身生存需求为目标,无需迎合外部市场,因而能够根据土地肥力变化调整耕作强度,维系土地生产力的可持续性。此时的城乡关系中,农村土地经营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城市对农村土地的影响微乎其微,土地与劳动者、自然环境构成相对独立的生态生产单元。

然而,资本主义商品农业的兴起彻底颠

覆了土地经营的自主性,农村土地经营被迫服从城市工业人口的消费需求与资本增殖目标,城乡关系从互不干涉转向城市主导农村土地利用,掠夺式经营成为必然。列宁明确指出,商业性农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工业人口迅速增长和产品运往市场”<sup>[452-53]</sup>,工业人口的激增导致城市粮食需求大幅上升,在土地私有制度下,这一需求直接推高粮食垄断价格,进而“大大抬高了地租”<sup>[455]</sup>。土地价格作为“预先计算出来的地租”<sup>[455]</sup>,使地主与商业性农场主将土地视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而非需要养护的生产资料。为了迎合城市市场对农产品的持续需求、获取高额地租与利润,农村土地经营不再遵循自然规律,而是通过加大耕作强度、压缩土地休养时间等方式追求短期高产,即便“土地的生产力受到掠夺”<sup>[456]</sup>也在所不惜,掠夺式经营成为商品农业服从城市需求的直接表现。

可见,这一服从城市需求的掠夺式经营,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城乡剥削关系在土地利用上的具象化,既破坏了土地肥力的可持续性,又进一步固化了城市攫取与农村受损的城乡不平等格局。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商品农业中“商业性农业和非商业性农业相互掺杂”<sup>[453]</sup>,农民在“货币的权力”<sup>[453]</sup>压迫下,即便保留部分自给性生产,也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入商品生产以满足城市需求。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利,农场主与农民往往只注重农产品产量而忽视土地肥力的补偿与养护,导致土地经营与土地肥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切断了城乡间的物质循环,土地被索取的养分无法得到充分归还。城市通过垄断价格与地租机制,从农村土地经营中攫取大量经济剩余,而农村则承受着土地

肥力衰退、生产条件恶化的代价。这一土地掠夺式经营不仅使农村丧失了土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更让城乡关系从经济依附延伸至生态依附,农村彻底沦为城市发展的“土地资源库”,城乡分离的结构性矛盾在土地维度被进一步深化。

### 三、资本主义加剧农村阶级分化并引发城乡人口单向流动

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逻辑,既使得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阶级分化,又催生了劳动力向城市集聚的城乡人口单向流动,从而加剧了城乡发展失衡。

(一) 农村阶级分化改变了农民阶层与城市资本的整体性关联

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农村阶级分化,其影响在于打破了传统城乡关系中农民阶层与城市资本的模糊化、整体性关联状态,重构出基于不同阶级属性的差异化城乡互动。列宁对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规律的剖析表明,商品经济与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原本作为城乡联系中介的农民阶层发生改变,进而推动城乡关系从乡村依附城市转向不同农民阶层与城市资本的选择性、对抗性关联,深刻改变了城乡关系的内在结构。

传统城乡关系中,农民阶层以整体性形态与城市形成松散关联,而资本主义引发的农村阶级分化,首先解构了这一整体性,使农村形成了与城市资本呈现不同关联特质的对立阶层。列宁指出,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就是农民分裂为“把农业当成工业的农场主”<sup>[453]</sup>和“雇佣工人”<sup>[453]</sup>的分化过程,这一分裂直接改变了城乡关联的主体基础。农场主阶层作为农村中的资本主义代表,其生产目的已从自给自足转向商品交换,与城市资本形成协同性关联,即他们“为出售而生产粮食”<sup>[456]</sup>,收购原料,雇佣工

人,本质上成为城市资本在农村的延伸载体,通过粮食外销、原料供应等渠道深度融入城市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之相对,农村无产阶级即“千百万的雇农和日工”<sup>[6]28</sup>以及破产农民,则与城市资本形成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性关联,他们失去土地或仅拘守小块土地,不得不通过出卖劳动力维系生存,成为城市资本与农村农场主双重压榨的对象,其与城市的关联体现为劳动异化下的依附性生存关系。“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处于中等地位的农民,即传统意义上的小农越来越少,除一小部分进入富农之列,大部分难免沦为下等户和农业工人”<sup>[8]</sup>,这一阶层分化使原本统一的农民群体不再以整体状态与城市关联,而是形成两类截然不同的城乡关联主体,彻底打破了传统城乡关联的整体性基础。

农村阶级分化催生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关联的市场化导向,使农民阶层与城市资本的关联从间接、松散转向直接、紧密,而关联性质也随阶层属性呈现显著差异。列宁认为,商业性农业的广泛发展以非农业人口的大幅增加为前提,而工业人口的迅速增长引发粮食需求缺口,推动农村生产向商品化转型。这一转型使农场主阶层与城市资本的关联具备了明确的利益关联属性,城市资本需要农村提供粮食、原料以支撑工业生产,农场主则依赖城市资本的市场渠道实现产品增值,二者通过商品交换构建起相互依存的市场化联系。即便在宗法式经济残余严重的地区,农民“从属于市场的现象也十分普遍”<sup>[4]3</sup>,破产农民为获取生产生活资料,不得不接受城市资本与商人的盘剥,其与城市的关联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被动依附。这一差异化的关联形态,进一步瓦解了农民阶

层与城市资本的整体性关联。

农村阶级分化还催生了农民阶层与城市无产阶级的新型关联,这一关联超越了传统城乡对立的范畴,成为重构城乡关系的重要因素。列宁“始终坚持人民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强调了要坚持以苏俄人民利益为中心,彰显了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在调查研究中的运用”<sup>[9]</sup>,他在实践中观察到,俄国工厂工人与农村无产阶级、破产农民存在天然的密切联系,这一联系使城市无产阶级能够将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思想传递给农村落后阶层。而劳动农民与投机农民的分化,进一步明确了城乡进步力量的联盟基础,即劳动农民“为了供应城市里挨饿的工人,按照国家固定价格,把4000万普特粮食交给了国家机关”<sup>[10]160</sup>,与城市工人形成利益共同体;投机农民则“利用城市工人的饥饿和困苦,非法地按相当于国家价格十倍的高价”<sup>[10]160</sup>,与城市资本沆瀣一气。可见,这一基于阶级属性的关联重构,使城乡关系不再局限于资本主导的经济关联,更衍生出阶级联盟层面的政治关联,彻底打破了传统城乡关系中农民阶层与城市资本的单一整体性关联,形成了多元、分化且内含对抗与联盟的新型城乡关联格局。

## (二) 农村阶级分化催生基于不同阶级身份的城乡流动新模式

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农村阶级分化,打破了传统宗法制度下城乡人口流动的封闭性与偶然性,催生了以阶级身份为标识的城乡流动新模式,深刻重塑了城乡关系的内在结构。这一流动模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城乡的扩张相耦合,形成了不同阶级主体在城乡之间定向、有序的流动格局,其生成逻辑与运行特征在列宁对农业资本主

义发展的论述中得到清晰印证。农村阶级分化所形成的不同阶级主体,构成了城乡流动新模式的多元参与载体,使城乡流动从泛化无序转向阶级定向。列宁指出,农村阶级分化的核心是“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区别开来”<sup>[10]159</sup>,这一划分体现了城乡流动的主体差异性。就劳动农民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入侵使“农民已经不能再依靠自己剩下的小块土地来维持生活了”<sup>[165]</sup>,大工厂的发展“使小手工业者和农民日趋破产并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sup>[166]</sup>,破产后的劳动农民丧失了生产资料,只能以无产者的身份向城市流动,成为工业生产所需的雇佣劳动力,从而实现了由农村破产农民到城市产业工人的转变。而私有者农民、投机农民则凭借对余粮等生产资料的占有,以资本家、商人的阶级身份参与城乡流动,他们将农村的粮食等商品“拿来投机”<sup>[10]160</sup>,通过城乡之间的商品贸易实现资本增殖,形成了由农村投机者到城市商人资本家的流动路径。不同阶级主体的流动方向与目的差异,使城乡流动不再是随机的人口迁移,而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积累的阶级性流动。

农村阶级分化催生的城乡流动新模式,构建了城乡之间生产与消费、资本与劳动力的双向耦合关系,强化了城乡的经济依存性。列宁强调,商业性农业发展的前提是“大大增加非农业人口”<sup>[14]53</sup>,而工业人口的迅速增长又“造成工业国家的粮食不足”<sup>[4]53</sup>,这一城乡经济的互补需求,正是通过阶级分化主导的城乡流动来实现的。破产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大量“为挣工资而给资本家做工的普通雇工”<sup>[166]</sup>,解决了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城市工

业得以持续扩张。而私有者农民、投机农民的城乡流动,则承担了城乡商品流通的职能,将农村的粮食等农产品输送至城市,满足城市人口的消费需求,同时将城市的工业产品带回农村,为农村的资本主义生产提供物质基础。这一基于阶级身份的流动,使城乡之间形成了“农村提供劳动力与原材料、城市进行工业生产、产品返回农村消费”的经济流通过程,使城乡关系从传统的自给自足转向资本主义主导的分工协作,进一步巩固了城市在城乡关系中的核心地位。

城乡流动新模式的形成,还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城乡的全域扩张,使城乡关系从形式对立转向本质统一。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既适用于工业,也适用于农业”<sup>[14]52</sup>,农村阶级分化所催生的城乡流动,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破城乡地域界限的重要体现。破产农民向城市流动后,被纳入城市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体系,受资本家的残酷压榨,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组成部分;而由私有者农民、投机农民参与和推动的城乡之间的商品流动,本质上是资本在城乡之间的循环增殖过程,推动了商业资本向农业的渗透,加速了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这一流动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在城市占据主导地位,更通过流动的阶级主体向农村延伸,使城乡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见,城乡之间的差异不再是生产方式的本质差异,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城乡的不同表现形式,城乡关系由此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整体框架,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阶级分化主导的城乡流动新模式,加剧了城乡之间的阶级对

立,使城乡关系蕴含着深刻的阶级矛盾。流动至城市的破产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面临着资本家的“残酷无情地压榨”<sup>[66]</sup>,而农村的劳动农民则继续遭受地主、投机农民的剥削,城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投机阶级的矛盾相互交织。列宁所批判的“有了余粮就拿来投机,这就是剥削挨饿的工人”<sup>[101]60</sup>的现象,正是城乡阶级矛盾在流动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即投机农民通过城乡商品流动实现资本增殖,其剥削对象不仅包括农村的劳动农民,也包括城市的工人阶级。这一阶级矛盾的跨城乡渗透,使城乡关系不再仅仅是地域与经济的关系,更成为阶级斗争的场域,进一步凸显了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的剥削性与不平等性。

(三) 由阶级分化引发的城乡流动使得城乡生产关系趋于固化

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城乡人口单向流动,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乡领域的扩张与重构过程。这一以阶级分化为前提的流动,最终将城乡关系固定在资本主导的对立框架内,使城乡之间的生产关系对立由潜在状态转向固化形态。从流动的驱动根源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引发农村阶级分化,构成城乡人口单向流动的前提条件。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发展中“小生产到处被大生产所代替”<sup>[66]</sup>,这一过程在农村地区直接表现为农民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农民沦为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另一部分则转化为资产阶级,而绝大多数农民“‘落入了’小商品生产的‘网’”<sup>[475]</sup>,在资本挤压下难以维持原有生产模式。这一阶级分化打破了传统农村封闭的生产关系,失去生存依托的农民被迫脱离农业生产,形成向城市流动的人口迁移。与此同时,城市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

廉价劳动力,正好与农村流出的雇佣劳动者形成需求对接,这一基于阶级分化的流动一开始就带有资本剥削的印记,使城乡关系从传统的互助互补转向资本主导下的供需适配,为后续生产关系对立的固化奠定了基础。

城乡人口流动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完成在城乡领域的双重渗透,推动城乡对立从形式走向实质。在城市地区,流入的农村劳动力成为资本主义工厂的雇佣工人,资本家将“联合起来的工人所进行的这种大规模生产的全部利润装进自己腰包”<sup>[66]</sup>,形成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在农村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未因人口流出而消退,反而因城市工业的需求进一步深化,农村成为城市工业的原料供应基地,农业生产逐渐服从于城市资本的利益诉求,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关系被商品经济主导的生产关系所取代。列宁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sup>[49]</sup>,这一分离是资本主导下的城乡职能重构。城市成为资本积累与剥削的中心场域,农村成为资本掠夺原料与劳动力的附属区域,城乡之间形成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人口流动则成为维系这一生产关系的必要纽带。

由阶级分化引发的城乡流动最终通过固化城乡职能定位与利益分配格局,使资本主义城乡生产关系对立成为难以逆转的稳定形态。列宁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sup>[49]</sup>,这一人口流动趋势最终固化了城乡的核心职能,即城市牢牢掌握生产资料与资本优势,主导着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分配,农村则被限定在原料供应与劳动力输出的从属地位,无法掌控自身生产发展的主导权。“在

列宁看来,资本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被资本主义垄断所取代”<sup>[1]</sup>,因而在利益分配上,城市资本家凭借资本优势占有大部分生产利润,城市工人获得维持生存的工资,而农村劳动者无论是留在农村还是流入城市,都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这一基于职能与利益的固化格局,使城乡之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立不再是阶段性的现象,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城乡关系的常态。正如列宁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决定了工业中可变资本相对增加与农业中可变资本绝对减少的趋势,这一趋势通过城乡人口流动不断强化,最终使城乡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立获得支撑,形成稳固的对立结构。

由此可见,这一固化的对立关系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使农村始终处于依附城市的被动地位。农村失去大量优质劳动力后,生产水平难以提升,只能持续依赖城市工业的需求调整生产,从而“使生产陷入更加依赖原料供应与劳动力输出”的恶性循环。然而,城市则凭借资本与劳动力的集聚效应,不断强化生产优势,进一步巩固对农村的剥削与控制。因此,因城乡人口流动而固化的这一对立关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它使城乡之间的矛盾不再是简单的地域发展差异,而是上升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城乡关系的本质属性。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论“三农”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2]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N].人民日报,2025-12-31.
- [3] 张丽丝.列宁资本主义观的历史考察——辩证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J].科学社会主义,2024(4):60-67.
- [4]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刘明明.列宁资本主义现代化批判的特点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迪[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2):78-85.
- [6]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王甄玺.列宁生态正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理论月刊,2024(6):36-44.
- [8] 肖贵清,冯梦麒.毛泽东和列宁农村调查研究之比较[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9.
- [9] 魏志达.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关于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阐释及其现实观照[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4(2):15-22.
- [10]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何玲玲,张泽宇.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路径:数字帝国主义还是数字帝国?——从列宁与奈格里、哈特的方法论谈起[J].科学社会主义,2025(2):127-134.

责任编辑:马俊

# 大众研究及其历史回响:马克思群众思想与勒庞群体理论比较分析

张国军 许丽娟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摘要]**面对大众崛起,马克思和勒庞构建了立场对立、进路迥异的群众思想和群体理论。马克思认为群众是被异化的历史主体,要消除异化、实现群众解放;勒庞则将大众视为无意识的乌合之众,试图消解大众、维持精英统治。马克思从群众特性的内在张力中发现了共产党领导与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辩证统一,实现策略是领导和依靠群众;勒庞则试图通过揭示群体心理诱导和塑造大众意识,以操控其行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群众路线,团结带领群众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就,并将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注入制度建构。文明的生长有赖于成功应对挑战,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需持续发挥,西方国家则需应对政治极化的后果。

**[关键词]**历史主体 乌合之众 群众路线 右翼民粹主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制度优势及其治理效能已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要素。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和依靠群众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本框架与运行逻辑。有研究认为新中国的建立基于“群众”观念,西方国家建立则是从“公民”概念

出发<sup>①</sup>。该论关于中国的分析颇为中肯,但对西方的论断则可能使人对当代西方民主政治运行产生误判。其实,现代西方政治建立之初秉持“公民”逻辑,后来则向“群体”逻辑偏移,促成这一偏移的是大众在19世纪的崛起。勒庞为应对大众崛起而构建群体心理学,这又成为熊彼特将代议制民主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式民主的理论悖论与实践困境”(立项编号:21&ZD160);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党建引领超大城市基层服务型治理研究”  
(立项编号:25SKGH017)。

收稿日期:2026-01-20

作者简介:张国军,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许丽娟,成都东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重构为选举民主的基础。马克思群众思想和勒庞群体理论都产生于大众崛起时代,却具有不同的理论旨趣和逻辑链条,并深刻影响了东西方政治发展。本文试图在理清二者理论进路的基础上,着重对其差异进行系统比较,进而探讨二者对中西制度建构和变迁的影响。

### 一、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

在前现代社会,人的价值一直遮蔽于自然、神明、英雄和圣王,大众是消极被动的存在。文艺复兴以来,人开始对自身价值进行重新审视,启蒙思想家高度颂扬人的理性,其口号即“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sup>[21]</sup>。理性具有普遍主义特征,个体理性是无差别的,那么人格、尊严、自由和权利也应普遍平等,进而政治参与的通道应向所有人打开。在启蒙理性普遍化支持下,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民众抗争终使大众在政治上崛起。面对大众时代到来这一共同背景,马克思和勒庞基于不同的现实关切形成了不同的问题意识。

#### (一) 大众时代到来

在法国大革命的持续和蔓延中,大众释放的力量不仅推翻了君主统治,更将现代政治理念扩散到其他国家,形成示范效应。在科学发展、思想启蒙和政治革命的冲击下,旧制度渐趋崩溃,随之而逝的还有传统的阶级结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传统纽带的破裂使个体被抛离于稳定结构,成为原子化的存在。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人被吸入机器大工业生产链条,成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工具。无产者的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关键环节,但他们却未享有相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因而大众抗争在19世纪此起彼伏。

马克思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小农自给自足且相互隔绝,“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

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sup>[3]566</sup>,机器大工业生产则使资产者和无产者聚集于城市,群众的主体由分散的小农转变为聚合的工人。共同的处境和抗争使分散于不同工厂的工人逐渐意识到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群众觉醒为阶级,形成革命行动的自觉。无产阶级在思想和组织上行动起来,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进而成为历史进步的行动主体。勒庞的理论形成稍晚于马克思,民众抗争带来选举权逐渐普遍化,勒庞敏锐地察觉到民众进入政治带来的民主大众化趋势,惊呼“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sup>[42]</sup>。勒庞把大众崛起称为新群氓的诞生,对其既蔑视又恐惧。

在大众崛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和勒庞对大众分别作出了历史主体和群氓反叛这两种不同的判断,构建了迥异的大众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群众”一般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普通民众。虽然不少论著也将勒庞著作法文版的“Foule”和英文版的“Crowd”译为“群众”,但勒庞描述的是无意识的群体化存在状态,与中国语境中的“群众”并非一回事,这一翻译“不仅存在‘政治不正确’的可能,在学术上也有错讹的危险”<sup>[5]</sup>。因此,本文的“大众”概念是对普通民众的不带价值判断的描述,将大众崛起视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历史现象,并分别用“群众”和“群体”指称马克思和勒庞的“大众”研究。

#### (二) 马克思与勒庞的问题意识及其来源

马克思的群众思想源于现实和实践,建立在对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把握基础上。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机制,马克思认为造成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的根源在

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其秘密在于剩余价值,并且,“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sup>[6]743</sup>。唯有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才能摆脱“异化”,真正实现自由。由此,“消除异化”和“群众解放”成为马克思群众理论的追求,这也是马克思群众思想的问题意识。

组织群众运动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即共同的目标和群众的相互联系。在分散的农业和家庭作坊生产中,社会结构被民族、宗教、阶级、家族和政治等多个维度切割得支离破碎。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则消灭了诸种差异性,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使阶级关系对立化、阶级对立简单化,进而使工人运动能够产生共同目标。同时,机器生产使分散的群众得以聚集到一起,为阶级意识的觉醒和组织动员群众提供了便利,从而使工人群众具有了在政治上崛起的可能。

大众崛起的冲击强化了西方思想史中忧惧大众的传统,自埃德蒙·柏克以降,西方知识精英极力贬低大众,进而对民主也极为抵制,“完美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因为它是最无耻的,所以它也就是最肆无忌惮的”<sup>[7]125</sup>。此后,“多数暴政”命题经由托克维尔、密尔、泰纳、阿克顿等人的阐发在西方思想界流传开来。知识精英视大众为暴乱推手,主张对选举权进行严格的财产和身份限制,将大众阻拦在政治之外。但是,作为现代西方制度建构的政治哲学基础的自由主义却是普遍主义的,排斥大众与普遍理性的假设并不相容,因而,

限制参与的自由民主政治遭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反噬。

大众崛起是历史必然,消极抵制只会激起更激烈的抗争。勒庞也对大众崛起深感忧虑,但他并未止步于恐惧,如他所言,“最杰出的现代史学家泰纳,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也理解得非常不全面,这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应当研究一下群体的禀性。”<sup>[14]8</sup>勒庞在泰纳、西盖勒、塔尔德等的群体理论基础上提出“群体精神统一律”,认为大众是心理层面的组织化群体,个体在暗示、催眠、传染等机制作用下被群体无意识裹挟,成为“乌合之众”。应时而生的群体心理学旨在透析大众,揭示其心理和行为机制,教导政治家消解大众对精英统治的威胁。相较于多数暴政命题及其理论推论,群体心理分析更进一层,成为西方大众研究、民主理论和民主政治转向的人学基础。

## 二、定位描述:“历史主体”还是“乌合之众”

马克思和勒庞针对大众崛起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论断。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展示了作为历史主体的“群众”的处境和复杂性,勒庞则以其“群体”心理分析展现了人性的幽暗。古希腊以来的思想史一直存在着对大众的诬蔑和敌视,柏拉图认为平民缺乏知识、放纵欲望而无节制,民主制也被他视为仅次于僭主制的最坏政体,这奠定了西方思想界大众观的基调。面对思想史的巨大惯性,马克思站在被压迫的民众的立场上对其进行革命性颠覆,在他人看到负面的地方,马克思都看到了正面,为他人所咒骂的行为,马克思都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sup>[8]</sup>。马克思将群众视为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历史进程的主角。勒庞则延续西方思想史传统,对群体抱持恐惧且蔑视的态度,视其为文明破坏者。

### (一)马克思的群众画像

第一,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主体性是群众的根本特性。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之前,历史进程由各种类型的统治集团掌握,群众因处于被统治、被奴役地位而被排斥在历史之外。马克思颠覆了以往漠视群众的“哲学家的哲学”,构建了“群众哲学”,马克思指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sup>[9]286-287</sup>。马克思认为正确认识历史的动力和规律的前提是科学认识“人的本质”,对“现实的人”的认识是马克思思考社会历史问题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存在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人存在,人首先要满足吃喝住穿等需求,物质性的实践活动是历史的发源地。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是实践中的“现实的人”,正是实践着的人民群众在劳动中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进而创造历史。马克思据此驳斥了思辨唯心主义的抽象人性论,“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sup>[9]350-351</sup> 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创造一切”,马克思认为,群众与思想是辩证统一的,思想要作用于现实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并且,隐藏在历史发展背后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动力是人民群众。

第二,群众在阶级社会中是被剥削和压迫的对象。“群众”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但阶级社会中的群众始终是处于被剥削和压迫地位的多数人,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群众的主要组成者是无产工人。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格局就是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分离以及少数人对

多数人的剥削和统治,剥削并未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减轻,只是变得更加隐晦。在19世纪,这种剥削和统治关系被遮蔽于仅能选择被谁剥削的“自由”和大众甚至没有选举权的代议制“民主”。

马克思把工人普遍贫困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残酷的剥夺,就是资本的起源”<sup>[10]570</sup>。工人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生产贫困。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生产方式造成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他人相“异化”,导致群众丧失劳动主体性,也缺失政治主体性。财富集中的结果是权力的集中,群众遭受经济剥削的同时还遭受政治压迫。群众被异化,其生机勃勃的创造力也被抑制。

第三,群众是历史主体,但“异化”使其具有局限性。群众在认知和行动上都有其局限,制约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且,“群众”外延较大,夹杂着各种不同的人群,“各种各样的群众的事物和人物汇合在‘群众’这一锅不纯的稀粥里”<sup>[11]99</sup>。因此,“一般说来,群众是不确定的对象,因而它不可能完成任何确定的行为,也不可能同任何事物发生确定的关系”<sup>[11]97</sup>。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对群众的客观局限性进行道德归因和指责,而是将其置于更为本质和现实的生产关系中进行考察,揭示群众的局限性背后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基础。

马克思认为群众的局限性是其饱受剥削和压迫的结果,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成为

资本增殖的工具,“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围绕资本增殖展开,“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sup>[6]487</sup>,从而使群众全面陷入机器牢笼。一方面,群众的生活条件恶劣,文化教育落后,精神处于困乏状态,主体意识和潜在力量被禁锢。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和国家机器,进而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以此控制蒙蔽民众。基于群众的局限性,教育、引导群众自然成为马克思群众思想的支点。马克思认为要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但对于群众的局限性,则要诉诸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先进性予以克服。

第四,群众的需求是具体化和世俗化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活动和事业,但不能脱离利益去空谈,“‘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sup>[9]286</sup>。群众实践活动背后的动力是利益,利益是客观需要的自觉体现,这本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群众追求的利益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并且有先后顺序,首要的是经济利益。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包含公民要素、政治要素和社会要素,并按照“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的顺序递进发展<sup>[12]10-13</sup>。而对于群众来说,基于抽象的天赋人权学说的法律政治权利并非其首要追求。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公民权利、代议制民主的“虚伪”,认为普选权一直被滥用,“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sup>[10]196</sup>。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群众思想。正如邹谠所说,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以“群众”为基础的,“群众要求的不是抽象的人权,

而是社会、经济上的权利,例如要土地,要求男女平等。中国革命是从争取社会经济权利开始的,进而要求政治权利,要民主。”<sup>[13]17</sup>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群众,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持续拥护,是因为共产党能够切实深入群众,理解群众所思所想,进而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的四个特性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对群众特性的全面正确认识,为马克思群众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群众特性的角度来说,马克思群众思想逻辑缜密的表现即在于其对群众特性内在张力及其消解之道的阐述。群众是主体性和局限性的复合体,但主体性是群众的根本特性,更为重要的是,群众的局限性可以由先进政党来克服。正是“以党之先进应对群众之局限”这一重关系的存在,使共产党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成为党的事业的制胜之本。群众诉求的利益性和世俗性是先进政党调动群众进行社会创造、发挥其历史推动作用的条件,党的教育和引导是实现群众内在潜能向显在动能转变的关键。

## (二) 勒庞的群体素描

勒庞笔下的群体是心理层面的组织化群体,受群体精神统一律支配,显著特征是“去个性化”。勒庞认为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埋藏于种族情感深处的“无意识”,个体的本能和情感这些构成无意识的元素具有相似性,当个体进入群体,理性被无意识湮没,人的异质性被相互间的同质性吞没。进而,无论个体的职业、身份、智力或生活方式有何不同,一旦融入群体,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就趋于一致。勒庞认为,个体消融于群体无意识的形成机制在于暗示和传染。个体进入群体犹如被催眠,失去人格意识而进入催眠师操纵下的迷幻状态。在群

体中,政治家扮演了催眠师的角色,群体的观念来自政治家的暗示,暗示的内容通过传染机制迅速扩散,使群体情感迅速同一化。个体进入群体后,“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sup>[418]</sup>在群体狂热催动下,暗示的内容必须立刻成为现实,由此产生群体行动。

群体无意识衍生出群体的一系列特性。第一,群体的道德具有双重性,既可以做出暴行,也可以变得高尚。一方面,本能的冲动不断摧残理性的自我控制,群体中的个体会充分释放欲望,突破人性下线。原因在于个体进入群体后会感受到群体所具有的气势不可挡的力量,这种“合群的自大”使个体获得一种群体安全感,使其敢于在群体掩饰下发泄源于本能的欲望,甚至使其处于激奋状态,认为群体就是真理和正义。另一方面,当群体受到崇高目标和理念激励,也会表现出崇高的不计名利、英雄主义、牺牲和献身精神。此时群体的道德境界,远非孤立的个体所能及。

第二,个体融入群体后丧失判断推理能力。个体行为往往基于深思熟虑,一旦融入群体,个体智识和洞察力就被群体无意识消融,因而群体智力总是低于理性个体。论证和逻辑对群体而言苍白无力,高深晦涩的理论更不起作用,群体喜欢简单而肯定的观点。勒庞认为群体做不了政治管理这种需要一定专业素养的事务,试图在侧面证明精英统治的合理性。群体推理能力欠缺,取而代之的是形象化的想象力,因而能打动群体的是鲜明的形象,而不是事实本身。因此要想影响群体,就必须把事物改造成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

第三,群体性格是偏执专断、冲动易变。个体融入群体后丧失理性思考能力,变得轻信和易受怂恿。群体一旦接受暗示把某

种东西视为真理,一切与之不符的观点都被视为谬误,思想偏执使其永远在整体接受或全盘否定两个极端之间漂移。所以,勒庞认为,要打动群体,就要采取断言、重复、言之凿凿的方式,而不是诉诸理性。除了性格偏执和情绪夸张,群体还是冲动、善变、急躁的。群体是外部刺激的奴隶,由于刺激因素多变,群体也会随着外部刺激或暗示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sup>[492]</sup>。另外,群体数量给个体以心理上的力量感和安全感,任何阻碍其行动的障碍都将被铲除,这使群体总是狂热急躁。在勒庞看来,群体的冲动、易变和狂躁特性使其难以进行有效自治,公共权力一旦被群体掌握,将导致难以估量的灾难。

### 三、根本宗旨:“解放”还是“消解”

群众为摆脱剥削和压迫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马克思从中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和秩序重构的希望,马克思的群众研究旨在促进群众的解放事业,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群众“创造性”的高度期待相反,勒庞关注的是群体的“破坏性”,因而延续西方思想史对大众的恶评,且其论证比以往思想家更为精致。勒庞认为群体是文明摧毁者,而文明一直是由精英创造的。为了维护作为统治阶级的精英创建的秩序,勒庞试图揭示群体的心理机制以对其进行控制,消解大众力量及其对既有秩序的威胁。

#### (一)马克思群众思想的“群众解放”

马克思群众思想的根本宗旨和最终归宿是实现群众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清晰阐述了群众解放的历史必然性、依靠主体、现实途径和未来状态。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无产者和有产者的阶级对立,马克思论证了无产阶

级解放全人类进而解放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异化”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内在逻辑的深刻批判,马克思将其与阶级分化联系起来,认为“异化”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维护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消灭阶级剥削唯有消灭其私有制根源,“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sup>[19]260</sup>

青年黑格尔派将消除贫困诉诸心理和自我意识的发展,马克思批判称,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异化的根源是现实存在的产物,仅仅通过思想斗争,群众解放只能是空想。马克思设想的路径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首先消灭群众的普遍贫困,接着消除隐藏在商品背后的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最后彻底消灭私有制、国家机器和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实现这一目标所需依靠的根本动力是无产阶级自身,马克思认为群众解放的使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承担,并且,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消灭私有制,进而消除异化。无产阶级只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解放。

## (二)勒庞群体理论的“精英统治”

西方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现代的代议政治,但由于排斥大众参与,早期的代议政治并非民主政治,毋宁说是资产阶级专享权力的新贵族政治。其实代议制本身就旨在遏制而非发展民主,毕竟,在19世纪之前,民主一直被视为古雅典式的以平民参与为特征的直接民主。大众崛起之后,尤其随着普选权逐步实现,代议政治才开始与民主融合而成为代议制民主,因而大众在政治上的崛起是现代民主政治得以

确立的基础。在此背景下,民主逐渐成为现代国家普遍尊奉的合法性原则,大众广泛参与成为现代政治的基本要素。勒庞认为大众参与冲击了既有秩序,那么,他就要对这种冲击做出符合既有秩序和利益格局的解释和应对。

勒庞认为少数贵族精英创造并引领文明,群体只是破坏者,他对群体特性与行为的阐述,表露出反对大众、维护精英秩序的倾向。由于大众崛起已无法逆转,勒庞认为,群体心理学是精英应对大众的最后武器,统治者要掌握群体心理机制和操控策略,才能将大众的力量纳入控制,使“民主”政治的运行符合其利益。正如麦克莱兰所说,勒庞尽可能使大众令人恐惧,目的是要兜售一种特别的精英意识形态,群体理论预测未来,敦促精英学习,使其能智胜和操纵大众<sup>[14]246</sup>。勒庞群体理论的深层关切是大众与精英的关系,尤其是二者在大众崛起时代的共处模式,这也使其理论构成了西方民主转型的人学基础。

通过对群体非理性的揭示,勒庞力图证明大众危险且粗暴,但同时其破坏力又可以利用和控制。据此,勒庞试图通过将大众污名化,摧毁大众参与和民主政治的正当性基础,进而将政治重新表述为贵族精英的游戏。基于这一逻辑,贵族精英对底层民众的统治就是符合自然理性的安排,“集群理论本身也是一套贴合管控之术的知识,它将政治调控和社会协调作为最根本的目的之一”<sup>[15]</sup>。勒庞把群体行为等同于暴力和破坏,其演绎链条是“大众=群体=暴民=文明终结者”,这一公式也就成为精英管控和操纵群体的元理由。

## 四、对待的策略:“依靠”还是“操纵”

马克思主张通过革命实现群众的解放,

这有赖于无产阶级政党对群众的领导和依靠；勒庞则试图在大众时代维持精英统治，其策略是通过塑造群体意识来操控其行为。策略的差异与二者根本宗旨的对立一脉相承，马克思群众思想最终落脚于领导和依靠群众推动时代进步，在现实中表现为共产党坚持的群众路线。与马克思相反，勒庞则出于恐惧和偏见走向了背离大众的操纵和利用。

（一）领导和依靠：基于马克思群众思想的群众路线

马克思认为，群众是历史演进的主体，但其实现有赖于先进组织的领导。群众的局限性使其无法洞悉历史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方向，自发的抗争也具有散乱性和不彻底性。只有接受掌握先进理论的先锋队的教育和领导，群众才能由自发转向自觉，发挥出潜在力量。由此，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对于无产阶级的觉醒和联合及其历史使命的完成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sup>[10]13-14</sup>。

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领导群众，在于其自身的特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sup>[11]44</sup> 作为掌握先进理论的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洞察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且，无产阶级政党并不存在独立于无产阶级之外的特殊利益。由此，无产阶级政党同时具备了纯洁性、坚决性、先进性这

三个特点和优势。

这些特点的存在，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是一种使命型政党，迥异于以“选举—执政”为目的、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联结中介的掮客型政党。使命型政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以先进的社会政治理论教育和引导群众，使其充分认知所处的时代性和结构性环境，马克思反复强调“教育工人”使其认识到阶级对立和自身责任的重要性。由于无产阶级政党不存在特殊利益，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勒庞笔下政治家对民众力量的消解和利用，而是与其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对群众的教育和引导旨在消除异化和剥削，实现“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根本而言是为了群众。

无产阶级政党不但要教育和引导群众，还要紧密依靠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大多数人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开展的运动，政党的作用在于领导和动员群众，群众需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己解放自己”的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sup>[10]484</sup> 唯物史观的目的是群众解放，群众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相信和依靠群众是马克思群众思想的内在要求。

领导群众和依靠群众是马克思群众策略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教育、引导、组织和动员群众投入革命斗争，另一方面，必须相信和依靠群众，使群众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摆脱由异化而致的局限性，彻底实现自身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群众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群众路线”，刘少奇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

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sup>[16]354</sup>。群众路线在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二)诱导和塑造:基于勒庞群体心理学的操控策略

在“多数暴政”命题流行时期,西方知识精英认为应对大众的策略是构筑防火墙,将其隔离在政治体系之外。然而,基于理性普遍化的大众崛起已成不可逆转之势,“限制大众进入政治”的手段已失去合法性,因此贵族精英不得不重塑与大众的关系。知识精英逐渐认识到,面对大众的愤怒,“解决办法不是筑坝,而是修渠;是控制和操纵,而不是禁止;是抑制,而不是遏制”<sup>[14]40</sup>。勒庞的群体心理分析为实现这种策略的转变奠定了人学基础。

勒庞一反作为现代性基础的普遍理性假设,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用以指代“大写的人”的理性并不存在,理性只属于极少数的精英,群体从来不受理性的指引。群体缺乏逻辑缜密的理性思维,在无意识作用下容易受心动事物诱惑,那么,只要掌握群体心理发生机制,政治家就可以很容易地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对群体进行欺骗、诱导和控制。勒庞坚信,对于理性个体,需要用证据使其信服,但对于群体,只需要激动人心的言辞即可将其操控。

从西方思想史演进的角度来看,群体心理学对人的重新解释影响巨大。萦绕在西方知识精英心头的对“多数暴政”的忧惧已被勒庞洗刷掉,将普通民众排斥于政治之外的策略也已无必要,因此,西方知识精英转而承认大众涌入政治的必然性,对待大众的态度由消极抵制转向积极应对,消解大众政治参与对精英统治威胁的策略也开

始从排斥转向诱导。当然,无论排斥还是诱导,目的都是控制,只是方式有所差异。控制策略转向的结果即西方理论家对民主的重塑,约瑟夫·熊彼特引用勒庞的群体心理学拆解了古典民主的基石,抽空了民主的价值内核,实现西方民主理论从代议民主到选举民主的转向。

## 五、源于不同人学基础的制度建构逻辑的差异

对人的认知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构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的群众思想和勒庞的群体理论分别构成了各自社会政治学说的人学基础,并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制度建构或变迁逻辑。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启蒙运动对人的理性和价值的弘扬,将普遍的、现实的、实质化的平等权利扩展到普通民众,并将其与共产党对群众的教育和领导统一起来,为社会主义制度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与马克思持续推进群众解放事业相反,勒庞则走向时代变革的另一面,试图通过操纵群体心理控制大众,群体心理分析经过熊彼特的应用成为西方民主理论转向的基础。

### (一)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制度建构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彻底转变。在传统社会中,外在秩序内化于心塑造人;在现代社会中,人不再将自己禁锢于既定秩序,而要将其价值理念向外投射改造秩序。这种转变起始于法国大革命,各方汇聚于自由平等理念之下彻底打破了旧秩序,价值理念的作用如此突出,以至于霍布斯鲍姆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由“哲学家”发动的革命<sup>[17]70</sup>。自此,世界各地在现代价值理念的鼓舞下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或不得不对它作出应对。

作为对理想社会政治状态的想象,价值理念决定着制度建构的原则和方向,甚至影响着制度运行的实际效能。“群众”这一概念蕴藏着中国政治的独特逻辑,中国语境下的群众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群众思想的基础上根据革命斗争和现实政治需要进行的理论创新。马克思所指的群众主要是作为无产者的工人,中国革命时期的群众则扩展到农民,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在群众思想的底层逻辑上,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群众思想的基本观点。

晚清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此后被卷进现代化的时代洪流。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是传统秩序崩溃带来的全面危机,旧制度逐渐失去治理效能,传统文化也遭受彻底质疑,政治和文化认同的消逝使近代中国陷入分裂,社会成为一盘散沙。秩序崩溃由列强侵略所致,分散的各派势力也无力抵抗侵略,中华民族在列强环伺下面临生死存亡的根本危机,因而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sup>[18]</sup>。

近代中国同时存在启蒙和救亡两大主题,但如李泽厚所言,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启蒙主题逐渐从属于救亡,最后被救亡主题全面压倒<sup>[19]26</sup>。其实,旨在从思想上批判传统秩序、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启蒙,延续的仍是辛亥革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逻辑,而晚清以来直至辛亥革命的各种救亡努力和方案都以失败告终。单纯的启蒙无助于挽救危局,救亡的紧迫性决定了启蒙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并服务于救亡的根本目的。应对全面危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把一盘散沙的中国整合、凝聚起来,

以新的启蒙逻辑完成救亡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马克思群众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群众路线”,并将其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群众路线’话语中,‘群众’概念找到了最有力的表达形式,并为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治运作提供了有效的概念工具与治理技术。”<sup>[20]283</sup> 党通过教育、引导、动员广大群众,推动群众的阶级意识觉醒,原来旨在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启蒙也在救亡压力下转变为对民众的教育和动员,最终,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

马克思发现了群众的主体性与局限性的内在张力,但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超越了这一张力,将其弥合于共产党的领导与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辩证统一。马克思群众思想中的“群众—政党”二维结构被中国共产党继承,表现为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的结合,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和群众的关系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党应当执行群众意见”,其二是“党应当教育群众和领导群众”<sup>[21]1310</sup>。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践行群众路线知民情、听民声、懂民意、聚民智,以更好地代表和实现群众利益。另一方面,群众因其局限性而不具有理论和行动自觉,需要由共产党对其进行教育和动员。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深入群众,认知、教育群众,将群众建构为具有高度整体性、自觉性的人民,实现了从自发的群众到觉醒的人民的转变。群众因外延较大而存在复杂性和局限性,人民则因觉醒而具有了纯粹性和至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创造者是觉醒了的群众,即人民。党通过将群众建构为人

民、进而动员组织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将群众的历史主体性落实到创造历史的实践行动中去,使“人民”成为“历史的创造者”。

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群众向人民转变的激发者,是群众解放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因此,党是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之间是“强制—服从”的权力关系,而是教育、领导、依靠和接近的紧密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余年来,始终以群众解放和民族复兴为己任,在洞悉国内外形势变化基础上对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持续的调适和优化,保证了党的先进性,从而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

马克思群众思想阐述了群众的历史和实践主体地位,这不仅是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上的论述和宣称,也不仅是政治运作中的策略和方法,更要贯彻到政治制度设计和运行中,使人民群众真正地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持续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都蕴含着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在中国政治中,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具有内在统一性,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密切联系群众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不断彰显。

(二)从代议政治到选举政治的制度变迁

在现代西方代议政治建立之初,约翰·

洛克将现代政治称为基于“同意”的统治,虽然这是对人民主权的消极界定,但是人民主权的观念已开始出现。然而,“人民”被严格限定于政治经济精英,享有选举权的人只是极少数。在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的英国,2400万人口中只有40万人享有选举权。这意味着现代早期的代议制,并非如今人们在普选权已经完全实现的背景下所理解的民主制,即并非大众代议制,实际上是一种贵族精英代议制,代议士所要代表并实现的是各种贵族精英的利益。由此,将人民主权限定于消极地表示“同意”,而非积极地参与“主权”,实质是一种以人民之名而行精英统治之实的形式合法化手段。

马克思通过阐述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机理,揭示了被当作统治阶级玩物的议会政治及其宣称的平等、自由、正义等价值的虚伪性<sup>[10][46]</sup>,推动群众运动持续发展。在大众崛起背景下,政治权利的快速扩展不可避免。从代议制运行逻辑来看,这意味着“人民主权”中的“人民”从精英扩展到大众,精英代议制将演变为大众代议制。面对代议政治大众化对精英统治的威胁,勒庞试图通过群体心理分析提供操纵民众之道。这成为精英统治与大众民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以民主的方式实现精英统治就成为西方民主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既要大众引入政治框架内,从而获得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又要限制大众的政治影响力,维持精英统治。二者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熊彼特通过将群体心理分析引入民主理论巧妙地“化解”了这一矛盾。

古典民主理论即精英代议制时期的“民主”理论,以普遍意志和选民理性为基本假设,二者都被熊彼特借用勒庞的群体心理学拆除。熊彼特延续勒庞的观点认为,报

纸、广播和广告等都会将公民塑造为心理群体,公民一旦进入政治成为选民,只会追随职业政客或某些集团的偏见。群体无意识使政客或利益集团能够根据其意图改变甚至制造人民的意志,熊彼特认为,人民意志“不是真正而是由人制造出来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只能是它的产物”<sup>[22]387</sup>。

在拆解古典民主的理论废墟上,熊彼特对民主进行了重塑。熊彼特摒弃了民主的价值理念,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将民主解释为一套选举产生政治家的方法,民主也就从选举代表以实现人民意志转变为选举产生人民意志的制造者。在熊彼特看来,民主并不意味着人民在进行统治,而只意味着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其统治者,他特意强调,民主政治实为“政治家的统治”。从民主的符号化表现和选民参与政治活动的内容角度来看,熊彼特的民主理论可被称为选举民主;而从这种民主的实质角度来看,它又是精英民主。精英统治与大众民主这两大相互矛盾的社会历史现象,就这样以“选举”为枢纽联结起来。

民主被化约为选举产生政治家之后,熊彼特进一步指出,即便是选举,民众的行为仍然不是基于理性判断的自主行为。候选人及其所在的集团或政党为了竞逐权力,往往通过制造议题、提出口号、树立形象等方式吸引和诱导选民,候选人相对于选民居于主动地位,选民只是被动地接受其影响,因而,“选民的选择——在意识形态上被尊称为人民的召唤——不是出于选民的主动,而是被塑造出来的,对选择的塑造是民主过程的本质部分”<sup>[22]412</sup>。按照熊彼特的逻辑,选举政治的实质明明是精英统治,却通过“选举—被选举”这种凸显“主体—客

体”关系的方式,给选民造成了精英是由自己主动挑选出来的错觉。随着竞选的专业化和商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选举政治愈来愈戏剧化。不过,选民以为自己是看戏人,其实只是被操纵的戏中人。

通过将群体心理学引入民主理论,把选举行为的基础从理性判断置换为精英诱导,熊彼特对传统民主理论进行彻底重塑,遮蔽了精英统治与大众崛起之间的矛盾,打消了西方主流思想界从古希腊时代以来对民主的惯有敌视。从此,被界定为“选举”的民主概念流行起来:其一,选举民主成为主流民主理论,如亨廷顿所说,“自二战以来,主流趋势是几乎完全用选举来定义民主。”<sup>[23]</sup>其二,民主不再被等同于“多数暴政”,因而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是作为合法性基础的不二之选被普遍接纳。在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和示范效应下,选举民主成为半个世纪以来第三波民主化的摹本,多党竞争式选举也成为衡量民主与否的唯一标准。由于抽空了民主的理性基础和价值内核,选举民主不仅销蚀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正当性,其普世化更在新兴民主化国家中制造了诸多动荡和衰败。

## 六、结语

汤因比指出,文明的起源和进步源于人类成功应对环境挑战,并且,一次成功应对又激发新的挑战,进而再次成功应对,挑战和应对周而复始,文明生长的情况才会出现<sup>[24]186</sup>。现代西方政治源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对普遍平等的理性的发掘,进而基于个体化的理性公民假设建构了代议政治。面对工业革命带来的无产者聚集和抗争,西方政治领域被迫向大众开放,取得了精英与大众的再平衡。基于群体心理分析的选举民主理论为这一转变作出了说明,而

从代议政治向选举政治的转变,也意味着西方政治的人学基础发生了从“公民”向“群体”的偏移。

随着 1980 年代经济全球化加速和私有化浪潮出现,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西方国家内部贫富分化扩大,尤其金融资本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另外,自 1960 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运动兴起并畸形发展,保护少数文化群体的“政治正确”形成对白人群体的逆向歧视,引起白人至上主义和保守主义者的敌视。在阶级阶层矛盾与种族民族矛盾的重合地带,民粹主义与右翼身份政治相融合,产生了席卷美欧世界的右翼民粹主义,它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对抗导致严重的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颇为吊诡的是,当代西方选举民主的理论基础是群体心理学,而对选举民主制度体系构成威胁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也是由深谙群体心理的右翼政治家发动选民形成的。

相较于西方传统政党对民众利益的漠视和民粹政治家对选民的煽动利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群众思想,贯彻群众路线,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sup>[25]</sup>在大变局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必然会遭遇各种挑战和风险,只有对其作出成功应对,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有赖于贯彻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是各国都面对

的重大问题。”<sup>[26]</sup>西方国家当前遭遇社会撕裂、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正在于财富分配出现巨大差距,这使民间充斥着不满和愤怒,政党和政治家许下诺言却又无所作为。近些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极为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已经取得显著成绩,由于大变局时代的发展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要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声音,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用。另外,经过百余年奋斗,当代中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群众的觉悟和素质已有很大提高,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不断增强,自主性和创造性也愈加凸显,这要求治国理政要更加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的参与和监督敞开大门。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的繁荣助长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论调的流行,认为 19 世纪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衰落,左右之争已无意义<sup>[27]462-463</sup>,西方的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最后的统治形式<sup>[28]</sup>。虽然争论的场景和具体内容会有变化,但资源分配、政治统治这些基本问题贯穿人类政治史始终,左右之争、制度之争正是这些基本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因而,争论不仅不会终结,还将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而持续。从大历史角度来说,这不仅是观念、制度层面的争论和比拼,还是汤因比所谓文明兴衰层面的较量。

#### 参考文献:

- [1] 邹谠.中国廿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4): 19-23.
- [2] 康德.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M].北京:中译出版社,2015.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 [5] 周晓虹.群氓动力学——社会心理学的另类叙事[J].社会学研究,2018(6):186-211.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8] 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J].政法论坛,2005(2):16-25.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12] 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13]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M].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 [14] 约翰·麦克莱兰.群众与暴民:从柏拉图到卡内蒂[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 [15] 刘国强,汤志豪.去蔽勒庞:身体规制与多维的集群“非理性”[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1):134-144.
- [16]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7]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1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
- [19] 李泽厚.现代中国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 [20] 李里峰.中国政治中的群众话语:一项概念史的考察[A].李里峰,主编.现代国家治理:第1辑[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21]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2]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23] Samuel Huntington. After Twenty Years: The Future of the Third Wave[J].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7(4):3-12.
- [24]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2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
- [26] 习近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J].求是,2022(10):4-9.
- [27] 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 [28]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J].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89(16):3-18.

责任编辑:马俊

## “全链条深度融合 合肥创新‘聚能’”等五则

### 全链条深度融合 合肥创新“聚能”

橘红色火环被“锁”进罐体,飞速旋转中,不断产生能量。

今年,安徽合肥科学岛的“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实现1亿摄氏度1066秒的高约束模等离子体运行。围绕EAST、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等大科学装置,合肥布局建设能源研究院,百亿元级聚变能源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2024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和机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合肥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已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总数达13个;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科创高地持续提升全市创新能级;全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稳定在万户以上,研发投入强度超4%。

科教融汇,加速推动成果从“书架”到“货架”。

合肥中科知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张床铺上方悬挂着一个“盒子”,用户无需佩戴电极,无需去除衣物,躺在床上就能完成心电图监测。

“‘盒子’基于我们研发的非接触心电图生成技术,利用毫米波雷达技术,实现高精度心脏活动监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合肥中科知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彦介绍。

得益于学校“赋权+转让+约定收益”的职务科技成果推广新模式,该技术3个月便走完相关流程,逐步实现产业化应用。

“职务科技成果约80%所有权赋予科研人

员,充分激发其积极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处副处长王奉超介绍,目前全校科研人员通过新模式转让科技成果76项,新设或增资企业69家,该创新模式正推广至全省106个科研院所。

“引才”“育才”并举,合肥3年来新增高层次人才3万余人,创新创业平台科大硅谷高精度对接校友超1.5万人次;贯通产学研用,科研机构和企业互派人员挂职;匹配人才供需,合肥市省属本科高校与新兴产业紧密关联专业约占七成……

以投带引,金融“活水”滋养创新。

通过合肥国镜仪器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扫描电镜,每一颗微小的木槿花粉纤毫毕现。“公司成立之初缺少资金支持,科大硅谷直投500万元,后续又牵线许多商业投资。”公司负责人方小伟回忆,2023年公司落户科大硅谷,短短1年间完成从实验室技术到应用产品的跨越,“今年订单总额预计超千万元。”

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汽车……多个千亿元级“产业地标”,都是金融“活水”浇灌而出,合肥设立总规模40亿元的天使、种子基金群,投资360多个项目,累计资本放大系数超7倍。创立金融支持科技型企业“共同成长计划”,助力银企双方合作;17家科创金融工作站集融资对接、政策宣传于一体,实现县区全覆盖。

“坚持长期主义,合肥以国有资本等领投带投,撬动社会资本跟投,培育龙头企业,带动全产业链发展。”合肥产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江鑫说。

硬核支撑,强化科技软服务。

“致力于无源高精度传感系统研究的龚伟教授团队,终于成立公司了。”安徽创新馆技术经理人王瑞芳难掩兴奋,背后是她连续3年的专业服务;技术验证缺场景时,努力促成广泛测试;初创

缺资金时,就帮忙联系政府引导基金……

“像王瑞芳这样的持证技术经理人,我们已培养近 4000 人,他们是助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关键一环。”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说,“我们始终坚持以科技要素市场化配置为原则,构建高效协同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促成科技成果转化交易金额超 1670 亿元。”

合肥持续推动科技服务业发展,建立专业化科技服务网络,累计服务全省产业园区近 200 个。牵头发起成立全国科技大市场联盟,首批成员单位涵盖中国技术交易所、上海技术交易所等全国多地的机构。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合肥将围绕产业链,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说。

(作者:张志锋、田先进;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12 月)

## 从“风投之城”到“育林之城”

### “合肥经验”跃迁记

#### “合肥经验”1.0 版

以国资领投的“以投带引”为核心,通过重磅资本注入,成功招引一批龙头企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从“无中生有”到“从有到强”的跨越

#### “合肥经验”2.0 版

核心任务转向“育苗造林”:一是“育树苗”,即对具备高成长潜力的科技型创业公司进行精准投资和培育;二是“播种子”,即向更早期的实验室成果转化阶段进行布局,抢占技术源头

#### “合肥经验”3.0 版

核心在于构建“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打造资源归集最大化、要素链接最高效的生态,从传统的“募投管退”转向全生命周期陪伴企业成长,广泛吸引社会化机构成为合肥的城市级产业合伙人,促进多元资源在本地融合对接,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

在巢湖的波光中,映照出一座“风投之城”的脉动。

在新兴产业崛起的进程中,合肥最引人瞩目的发展故事之一,就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出了产业宏图”。如今,越来越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合肥经验”在此集聚,共同打造合肥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

从数据来看,“十四五”期间,合肥国资累计完成项目投资超 4300 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占比超过 45%。通过“以投带引”培育的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群快速崛起,资本市场“合肥板块”持续扩容,牵引区域经济能级跃升。

从动能来看,独具特色的“合肥经验”让城市发展的“路径”更加清晰。2022 年启动的“创投城市计划”,推动资本要素与优质项目深度耦合;政府投资基金与市场化基金协同发力,巩固拓展“科创+产业+资本”的发展生态。国资引领与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正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从模式来看,“合肥经验”的核心在于三大关键支撑:一是高度聚焦的产业发展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二是强大的国资实力和专业投资团队,精准洞察产业趋势;三是决策层对产业的深刻理解,能够在关键节点精准切入。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合肥独具特色的产业投资体系。

从未来看,合肥正推动“合肥经验”与时俱进,通过更大规模的产业基金进行前瞻布局,更加重视国资的引领作用和市场化基金管理机构的资源整合能力。

“合肥经验”迈入 3.0 阶段:从“移树”到“育林”的生态蝶变

合肥被业内誉为“风投之城”“产投之城”,这一声誉根植于其不断进化的发展模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刘志迎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合肥经验”的探索始于 2008 年,当初 1.0 版是以国资领投的“以投带引”为核心,通过资本注入,成功招引京东方、蔚来等一批龙头企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从“无中生有”到“从有到强”的跨越。

这一阶段被比喻为“移大树”——通过引入成熟龙头企业,快速奠定产业基础。

然而,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不能仅依靠几棵“参天大树”。“铺天盖地的中小微科技企业才是城

市经济发展的深厚根基。”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陈锐说。

基于此共识,“合肥经验”逐步升级至 2.0 版,核心任务转向“育苗造林”。这一阶段体现为两个维度:

一是“育树苗”,即对具备高成长潜力的科技型创业公司进行精准投资和培育;

二是“播种子”,即向更早期的实验室成果转化阶段进行布局,抢占技术源头。

在“合肥经验”2.0 阶段,合肥建投旗下芯屏基金参与组建顾中科技项目,2018 年合肥顾中科技成立后,迅速融入“芯屏汽合”产业链,2023 年 4 月成功登陆科创板;

2015 年合肥国资与台湾力晶携手组建晶合集成,从为京东方补链起步,如今已成长为国内第三大晶圆代工厂,2023 年 5 月登陆科创板时市值近 400 亿元;

合肥兴泰旗下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视涯科技落地合肥,如今公司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微显示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当全国各地开始兴起“以投带引”方式时,合肥已开启了新一轮的精耕细作。

“面对国资单独投入压力增大、投资风险凸显的瓶颈,合肥转向精细化运作。”合肥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陈文胜表示,合肥市投促局将主导产业链拆分为 11 条细分赛道,从产业规划、地方禀赋、技术趋势等多维度建立项目评价体系,系统性挖掘潜力项目,并成立专业国有投行——合肥市投资促进公司,由专业团队深耕产业信息挖掘、研判。

2025 年 1 至 10 月,通过这一体系新增亿元以上项目线索已超过 600 条。

“创投城市计划”应运而生,标志着“合肥经验”正式迈入 3.0 阶段。

合肥市投资促进公司战略投行部负责人陈婉琦表示,其核心在于构建“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打造资源归集最大化、要素链接最高效的生态,从传统的“募投管退”转向全生命周期陪伴企业成长,广泛吸引社会化机构成为合肥的城市级产业合伙人,促进多元资源在本地融合对接,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

“热带雨林”需要一套高效协同的灌溉系统。合肥三大国资平台——建投、产投、兴泰形成了紧

密配合的“铁三角”。

以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实践为例,合肥建投牵头投资蔚来并建设生产基地,奠定了其产业龙头地位;

合肥产投随后投资关键的电池、芯片、零部件等配套企业,完善产业链条;

兴泰则为这些重点项目,以及上下游的供应商、经销商、电池运营商等,全方位提供股、贷、债、担、保、租等集成式金融服务,注入金融“活水”,激活整个产业生态的运行与增长。

“合肥市在招引项目之后,会搭建科创培育及普惠金融等配套平台,招大引强的任务主要落在合肥建投集团身上。我们通过资本撬动、产业链招商、生态赋能的组合方式,重点聚焦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先后主导或深度参与了京东方液晶面板、蔚来新能源汽车、晶合集成电路等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兆志说。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由合肥国资引领带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完成投资近 2000 亿元,推动在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落地了 13 个百亿级投资项目,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

**以并购重组为抓手:从“投产业”向“做产业”转变**

“以前是找项目、投项目,现在是整合产业、做强生态。”陈文胜说。这句话折射出合肥资本运作的新方向——合肥正以并购重组为抓手,从“投产业”向“做产业”转变,实现政府、产业运营方、上市公司的三方共赢。

以合肥产投集团为例,2024 年 10 月,产投集团旗下创新投资公司与三佳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控制权,并于 2025 年 6 月通过上市公司公告“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众合半导体 51% 股权”。

“三佳科技是合肥市国资系统通过并购实控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是产投集团在集成电路产业的战略投资,获取三佳科技控制权后,通过资本市场的力量 and 平台,横向和纵向整合赋能合肥市已有产业链实体生态,推动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购只是我们培育做大产业的市场化手段之一,而非目的,因此在获得三佳科技控制权后,继而通过三佳再并购众合半导体。”合肥

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增长说。

陈文胜表示,与收购三佳科技的传统并购重组模式不同,最近合肥国资正在探索一种新型的参与推动产业引进的模式,这一模式在2024年以来国内并购重组市场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显得尤为亮眼。

“国资平台参与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后,并非亲自下场管理,而是依托具有深厚产业背景和运营能力的专业团队来主导公司经营。国资往往通过设立SPV(特殊目的实体)等方式持有股权。在这种模式中,国资平台更多地是扮演了赋能者和保障者的角色。”

这种模式创新点在于三方共赢:

对政府而言,能实现项目落地、产值增长、税收增加与产业生态完善;

对上市公司而言,国资提供安全垫,体外进入的股权架构赋予清晰退出通道,避免ST或退市风险,还能借助政府资源实现产业升级;

对产业运营方而言,无需巨额资金即可获得上市公司实控权,在董事会拥有较强话语权,主导企业转型。

为系统化推进这一模式,合肥正在构建并购招商的“买方库”(有整合能力的产业方)与“卖方库”(有并购价值的上市公司),并设立了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建汇并购基金等专业化工具。

目前,已吸引来自40多个细分赛道的头部项目与合肥对接。

“我们与头部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深度合作,共同挖掘标的,重点选择那些与合肥产业方向高度契合、原股东转型意愿强烈、存在价值重估空间的上市公司。”陈文胜说。

而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是并购重组的另一重点。围绕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空天信息、下一代人工智能、合成生物等领域,合肥市属国企已投资一批新公司和新项目。

合肥国资的并购决策始终遵循四大原则:专业团队联合顶尖专家论证、紧扣政策导向、全面法务财务尽职调查、周密商务谈判与风险预判。

**金融工具创新:为产业生态注入“活水”**

近年来,合肥通过并购贷款、知识产权证券化、定增、科创债、QFLP基金等多元工具组合,构建覆盖产业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支持体系,为“合肥

经验”3.0版注入金融“活水”,实现“产融共生”。

“金融工具必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实现产业引导与投资回报的平衡。”合肥新站科技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徐晏军表示。

作为并购贷款政策试点城市,合肥将科技企业并购贷款比例放宽至80%、期限延至10年。

今年3月,中信银行合肥分行落地全省首笔科技企业并购贷款业务,为合肥市某民营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并购交易提供并购资金支持。

对于轻资产运营的硬科技企业创始人而言,他们手握核心技术,却常常苦于缺乏固定资产作为融资抵押。如何破解缺资产难题?

合肥给出了创新答案——通过打造知识产权证券化模式,为轻资产科技企业开辟专属融资路径。

今年8月,兴泰控股旗下兴泰科贷牵头发行全国首单“园区企业+科技创新+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未来产业”ABS产品,将19家企业131项专利打包质押,评估总价值超4亿元。

“兴泰创新采用‘信用+知识产权质押’双维度增信模式,把原本分散、难以直接融资的知识产权资产整合打包并完成信用增级,转化为可在资本市场流通的ABS产品,成功打通了轻资产科技型企业的融资堵点。”陈锐说。

在服务模式上,合肥创新构建“并购贷款+并购顾问”服务模式,积极引入内外部资源,将金融服务延伸至交易撮合、执行、整合的全流程。“这一模式大幅提升企业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徐晏军说。

科创债券则为成长期科技企业提供了重要的中长期直接融资渠道。

晶合集成、顾中科技等企业都通过发行科创债,募集资金用于先进制程研发和产能扩张。2025年,合肥地区的科创债发行规模居全国前列。

为降低企业的发债成本、增强市场吸引力,合肥地方政府还设立了配套的贴息基金和风险补偿机制,有效提高了科创债券的信用等级和市场认可度。

外资渠道持续拓宽。合肥成立首只QFLP基金吸引外资投向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联动龙头企业海外分支机构赴欧洲、中东等区域“点对点”招商,推动产业生态融入全球产业链。

这一切金融创新的基底,是合肥精心培育打

造的国资“基金丛林”。

“十四五”期间合肥陆续组建了国资“3+N”系列产业基金、全省首只S基金、全省首只AIC股权投资基金等,截至“十四五”末,国资基金数量超170只,注册规模超2800亿元,实缴规模超1400亿元,累计投资项目超2100个。

(作者:胡尧、邓贞;来源:《上海证券报》2025年12月)

## 原始创新的打头方阵,安徽在列!

不久前,一份世界级倡议——《合肥聚变宣言》从位于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主机大厅发出。宣言倡导开放共享、合作共赢,鼓励各国科研人员到中国开展聚变合作研究。

“十四五”期间,安徽在聚变能源、量子信息、深空探测三大领域实现世界级突破,研发投入近1400亿元,强度居全国第7位,高新技术企业达2.3万家,较2020年增长2.7倍。

### “追太阳的人”步履不停

近日,记者走进BEST装置主机大厅,主机系统中最重要的部件,也是国内聚变领域最大的真空部件——杜瓦底座已精准“落座”。

“BEST装置是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它将在我国第一代‘人造太阳’EAST装置基础上,在世界上首次实现聚变能发电演示。从而补上‘实验堆’到‘示范堆’的工程化空白。”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建文介绍。

这家企业的成立,也是全国首次引入社会资本建设BEST装置,标志着中国聚变能商业化进程稳步推进。

循着“逐日”的足迹,记者追踪至EAST装置升级改造现场。“眼下,我们正在进行新一轮升级,明年2月前,它将完成加热系统和水冷系统改造,继续服务新一轮聚变装置预研工作。”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在安徽,“追太阳的人”总是步履不停,陈永华就是如此。从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转型成为科创企业负责人,他一干就是近10年。“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真‘虎’,觉得啥都能干。”陈永华

说。如今,他所在企业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产首台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已通过注册检验,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们计划最迟明年元旦前就要接收第一位患者。能够将大科学装置成果转化为让百姓获益的产品,我很荣幸。”陈永华说。

安徽省科技厅副厅长姚群向记者介绍,围绕布局建设的13个大科学装置及其成果,如今安徽已孵化、引进科技型企业100余家,覆盖超导材料、等离子体诊断、低温技术等多个领域。

“沿途如何多‘下蛋’?关键在于不断强化‘大科学装置+概念验证中心+市场化中试’全链条转化应用体系。”姚群道出其中奥秘。

### 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合肥高新区云飞路,被称为“量子大道”,这里汇集了30多家量子科技龙头企业,覆盖量子通信、计算、测量三大领域。

最近,搭载“祖冲之三号”同款芯片的超导量子计算机“天衍-287”也已完成搭建,其处理特定问题的速度要比现有最快超级计算机快4.5亿倍。“毫无疑问,这得益于‘国家实验室+高校+企业’协同创新机制,按照老路子,一些可能十多年才能落地的成果,现在三五年就能落地!”中电信量子集团董事长吕品说。

产业发展离不开创新生态。合肥么正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永建深有体会:“高新区1800万元投资和市创投的1200万元资金,帮我们跨过了‘死亡谷’。”

合肥通过设立天使基金、种子基金,并将风险容忍度分别提高至40%、50%,有效打通了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

目前,量子科技的应用场景正在加速落地。“安徽启动了量子信息‘千家场景’行动,到今年年底将落地300个应用场景,到2027年增至1000个。我们也积极行动了起来,比如采用量子精密测量进行中药检测、锂电池检测等。”在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贺羽看来,让量子科技以“看得见、听得懂、能体验”的方式,在千行百业、千家万户落地应用,是量子科技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前,安徽已集聚量子产业链企业100家,核心企业数量占全国三分之一。“其中,合肥拥有70余家,为全国首位。到2027年,我们力争培育上市

企业2家,量子产业规模达50亿元。”合肥市科技局副局长吕波表示。

### 深空探测领域发展方兴未艾

“在月球上盖房子,不需要从地球上运建材?”在深空探测实验室资源利用实验区,记者问。

“正是!”该实验室未来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杨洪伦指着月壤原位3D打印系统介绍,“这是一台可以利用聚光太阳能,将月壤高温熔融制成月壤砖的装置,制成的月壤砖强度高、隔热性好,可以满足月球科研站的交通道路、设备平台和建筑物建造需求,实现‘用月球的土、建月球的房’。”

要在月球上生存,水资源不可或缺。该实验室未来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祖琳告诉记者:“我们采用了一条独特的技术路线,克服了月壤开挖难、真空逃逸水汽收集难、水冰提取效率低等难题,效率高、功耗低,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当前该实验室正积极谋划培育深空能源、太空旅游等十大深空战略性新质产业方向,已经带动吸引一批商业航天公司和项目落户安徽,总投资额超百亿元。

今年7月,全国首个以深空探测命名、由中国牵头发起的航天领域国际科技组织——国际深空探测学会落户安徽。

“我们争取用10年时间,吸纳500个科研单位、10万名科学家,共同为探索宇宙奥秘、赓续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学会第一届理事会首任理事长、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表示。

(作者:丁一鸣、常河;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12月)

### 反对技术壁垒 弥合南北鸿沟

## 中国推进科技合作应对全球挑战

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人类共同挑战日益严峻,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科技究竟是少数发达国家独占的“工具”,还是开启未来、造福全人类的“钥匙”?中国积极推进科技开放合作,给出了坚定的回答。

从大科学装置向全球科研人员开放,到发起国际科技组织和大科学计划,再到推动数字技术惠及全球南方……过去一年中,中国将践行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一系列可参与、可共享的国际实践,在能源安全、深空探索、数字发展等事关人类未来的关键领域,探索协同创新、共同治理的新路径。

### 难关共克——携手建设大科学装置

在全球性问题面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近年来,中国在核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领域的技术突破,正不断将前沿科技与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现实需求精准对接。

2025年12月末,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的又一批重要部件在安徽合肥顺利竣工,即将起运交付。总部位于法国的这一实验装置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大科学工程,被称作全球最大“人造太阳”。中国于2006年正式加入ITER计划,承担项目工程约10%的采购包任务。作为ITER中国工作组重要单位之一,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承担了超导体、校正场线圈、磁体馈线等众多采购包,占中国承担ITER采购包任务的大部分。ITER组织发言人拉班·科布伦茨表示,中国对这一项目的贡献至关重要。

核聚变因其燃料来源广泛、碳排放极低、安全性高,被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视为具有潜力的长期能源解决方案。近年来,中国“人造太阳”团队不仅高质量交付了ITER的众多采购包,更承担了为ITER运行“打样”的重要任务,与ITER科研人员开展联合实验,演示和攻克ITER运行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在安徽,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十余年来屡破世界纪录,性能走在国际前列;不远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BEST)正加速推进建设,该装置力争在2027年底建成后演示聚变能发电。这里的科研团队没有关起门来做研究,而是欢迎全球的科学家加入进来共同迎接挑战。在EAST所在的合肥“科学岛”上,每年都有数百名外国学者到访,与中国同行进行交流合作。

2025年11月,十余个国家的聚变科学家齐聚合肥正在建设中的BEST主机大厅,共同见证中国聚变装置向全球开放合作。当天正式启动的中国科学院“燃烧等离子体”国际科学计划宣布,将面向全球开放包括BEST在内的多个领先的聚变能实验装置及平台,并通过设立开放科研基金、资助高频次专家互访交流、搭建联合实验平台等,

围绕聚变物理前沿问题开展合作研究。

“这是一个极佳的时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快速获得能源。中国的这一科学计划让我们得以研究以往装置无法研究的课题,尤其是燃烧等离子体。”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磁约束聚变研究所所长热罗姆·布卡洛西说。

欧盟聚变能委员会国际合作负责人理查德·卡门杰说:“人类今天已经认清了我们共同面临的能源挑战,更明白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单独解决这些难题,唯有全球聚变界走到一起,共同解决。”中国近年来推动的开放合作,为这一共识提供了现实支点。

深空探索作为人类共同事业,同样成为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领域。首个中国牵头的国际大科学工程——国际月球科研站国际合作,已支撑国家航天局与全球 17 个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中国的月背样品、探月工程载荷资源等吸引国际社会积极寻求合作,由中国国家航天局和安徽省人民政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共同组建的深空探测实验室,也与全球 60 多家海外科研机构签署合作文件并开展具体项目合作。

计划于 2029 年前后发射的嫦娥八号任务,是中国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的关键一步,目前,全球合作项目遴选结果已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公布,来自 11 个国家和地区、1 个国际组织的 10 个项目入选,包括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弗拉斯卡蒂国家实验室的“激光角反射器阵列”等。

2025 年 9 月,在合肥召开的第三届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家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近地小行星防御工程总体设想”,并呼吁全球合作伙伴开展积极合作,保卫地球安全。

“站在守卫地球安全与人类延续的角度来看,构建小行星防御能力,是全人类共同的任务。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贡献中国智慧,发挥中国力量,系统构建小行星探测与防御工程,和世界一起守卫我们的地球家园。”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吴伟仁说。

国际宇航联合会执行主任克里斯汀·费希廷格说,目前全球在小行星防御方面的努力仍然是非常零散的,国际社会需要找到共同的基础和协议,“这不是一个关于哪个国家、哪个机构先行的

问题,而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

### 机遇共享——科技红利惠及全球南方

发展成果跨越国界与鸿沟,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近年来,中国在推动前沿科技突破的同时,持续强调技术红利的公平与共享,尤其为全球南方国家参与新一轮科技变革提供了现实路径。

中国自主研发的大语言模型以好用、开源、免费、低能耗闻名,激励了更多的国家和企业进入 AI 领域投入研发和应用。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指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深度求索(DeepSeek)打破了美国对 AI 的话语权垄断。低成本与开放性的强强联合有助于普及 AI 技术,让其他国家的开发者能够入局。当美国公司在为试图进入该领域的竞争对手设置尽可能多的障碍时,中国却在开放这项技术。

当前,“人工智能+”正赋能千行百业,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各领域科技创新突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准智能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全球首个数据智能驱动的机器化学家平台正是其中代表之一。它由移动机器人、智能化学工作站、高通量计算系统与智能化学大脑四部分组成,能自己“读”论文、“想”方案、“做”实验,甚至自主“创”制新物质。面对 376 万种配方组合,人类团队验证需 2000 年,而机器化学家“小来”仅用 6 周就找到最优解,为利用未知的火星陨石催化制氧提供高效低耗方案,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合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精准智能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特任教授朱濯纓介绍,团队打造的机器化学家已经升级至 2.0 版本——机器科学家系统,初步建成了中央智脑驱动分布式创新的智能科研生态,覆盖全国 19 家科研院所和大型央企,正成为全球智能科研领域的关注焦点。目前,他们正构建机器科学家自主实验室国际合作网络,向合作国家共享其成熟的自主实验室技术方案,助力攻克能源、医药、农业等领域的技术难关,已吸引泰国、新加坡等国科研机构参与合作,并探索向东南亚、非洲等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推广,为全球智能科研生态贡献中国方案。

“通过辅助其他国家建立机器科学家系统,有助于打破欧美对科研人工智能数据的垄断,能够帮助大量国家实现科研、创新、创业的平权。”朱濯

纓说。

为更好弥合南北数字鸿沟,中国通过国际合作机制推进数字能力建设。在2025年末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李明介绍,未来5年中方将支持全球发展倡议打造“数字南方”品牌,通过和伙伴国共同设计数字赋能项目,助力弥合南北数字鸿沟,推动科技成果和技术应用更好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未来5年将为南方国家开展200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培训项目。

李明表示,中方将与伙伴国协商确定合作重点领域和方向,进一步强化伙伴国数字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利用数字技术赋能药物研发、农业增产、教育普惠、灾害预警等领域,助力全球南方稳步深度融入全球数字发展格局。

#### 规则共建——重塑全球科技治理路径

世界多数国家呼吁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通过科技合作推动国际规则共建共享,致力于打破长期以来“西方定规则、全球遵守”的旧格局,让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治理中拥有更多话语权。

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正试图将科技合作异化为地缘政治工具,以巩固其垄断地位。例如,美西方主导的《阿耳忒弥斯协议》构建月球开发的小圈子,并设立“排他性”条款,试图以美国为中心将太空资源“私有化”。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局长布里登斯廷明确表示,只有同意《阿耳忒弥斯协议》的国家才能与NASA合作在月球建立基地,而“那些破坏外空并使外空探索处于危险之中的国家”不应被邀请。这实际上将与美国立场不同的国家排除在外。

费希廷格表示,太空资源的利用,关键在于“平衡”,而中国在这方面一直表现突出。他指出,中国始终以高度开放的姿态推进国际合作,并积极接纳新兴航天国家参与相关科技合作。“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对新兴力量来说,要‘登上’全球航天体系这列已经高速行驶的‘列车’是非常困难的,而中国总是向它们伸出援手。正因为如此,中国在整合全球航天共同体、推动并构建一个以公平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航天生态系统方面,发挥着重要、而且是引领性的作用。”费希廷格说。

2025年7月,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在安徽成立,这是首个由中国担任牵头方的航天领域国际

科技组织。

深空探测实验室国际合作交流中心主任王中民表示,学会将通过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广泛参与和主导相关国际规则、国际标准制定,在国际舞台积极发声,打破国际封锁,防止脱钩断链,为重塑航天国际合作新格局、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同样在7月,于上海举办的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呼吁各方在遵循向善为民、尊重主权、发展导向、安全可控、公平普惠、开放合作的目标和原则基础上,切实采取有效行动,协力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

在聚变能源领域,规则共建的共识正不断凝聚。2025年11月,来自法国、英国、德国等十余个国家的科学家共同签署发布了《合肥聚变宣言》,倡导开放共享与合作共赢精神,鼓励各国的科研人员到中国开展聚变合作研究。在当前全球科技合作面临诸多复杂挑战的背景下,这一聚焦于共同未来的科学倡议,彰显了跨越界限、协力突破基础科学前沿的宝贵努力。

“中国正呼吁建立一个新的生态体系,让全人类共同贡献力量解决问题。”欧盟聚变能委员会主席詹弗兰科·费代里奇说。他认为,全球不仅高度认可中国聚变科研在短时间内取得的瞩目进展,更对这一开放理念深表认同。“科学是和平的驱动力,中国现在倡导的,就是全人类为共同的科学目标和未来的福祉并肩前行。”

(作者:刘菁、陈诺、何曦悦、吴慧珺;来源:《参考消息》2026年1月)

## 城市在“长大”记忆未走远

冬日的安徽合肥,逍遥津公园里,游人漫步于张辽塑像旁,遥想三国风云;淮河路步行街上,老字号与新店铺比邻而居,传统技艺与现代创意共生;工业遗产内,老厂房和新业态错落交融。一幅既饱含历史厚度,又充满当代活力的城市人文画卷,正在这里徐徐铺展。

“5公里长的主干道,5万常住人口,5家铁匠铺……”这曾是老一辈合肥人口中“江淮小邑”最为形象的素描。如今,翻开合肥的新名片:市域面

积 1.14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逾千万,经济规模突破万亿元,科技企业云集……数字的巨变,勾勒出这座城市数十年来惊人的发展轨迹与成长速度。

在“长大”的过程中,合肥以保护性更新的“细腻针法”,让历史的厚重感与未来的探索性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中交织。

### 焕新步行街区,激活百年风华

“百年淮河路,半部合肥史。”这句流传甚广的话,道出了庐阳区淮河路步行街在合肥人心中的分量。

合肥自秦代置县,古为庐州府治所,其核心区域位于今天的庐阳老城区。而这条长约千米、宽约 200 米的街区,不仅是商业繁华之地,更是一条流动的历史长廊。

明清的遗韵、近代的风云、当代的潮流在此层层叠加:曹操点将练兵的教弩台古意肃然,晚清重臣李鸿章故居静述晚清风云,风格各异的近现代建筑鳞次栉比,时尚靓丽的品牌店铺光影流转。它们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精心的规划与设计融为一体,成为市民漫步怀古、休闲购物的首选之地,也成为外来游客感知合肥气质的一扇窗口。

在庐阳区逍遥津街道九狮街居住了大半辈子的李宁东,是淮河路变迁最直接的见证者之一。“改造前,步行街就光秃秃一条主路,热闹是热闹,但总觉得少了点韵味。特别是背街的那些小巷子,像李府巷、撮造山巷这些,年头久了,路面坑洼,墙体斑驳,排水也不畅。一到下雨下雪天,出门深一脚浅一脚,污水有时候还会漫上来,气味难闻,住着确实不便。”回忆起往昔,李宁东的眉头微微蹙起。

转机始于 2019 年。随着合肥市对老城更新保护重视程度的提升,庐阳区专门成立了老城保护更新管理服务中心,淮河路步行街片区的大规模有机更新正式启动。

工程并非简单粗暴的大拆大建,而是一次“内外兼修”的系统性手术:地下,陈旧的管网被全面疏通、更新,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顽疾;地上,建筑外立面在保持历史风貌的基础上被精心修缮、平整,洗去岁月积尘,焕发新生光彩。

与此同时,10 余条像毛细血管般散布于主干道两侧的街巷,被同步纳入了改造的蓝图。

“改造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是对街区

灵魂的深度挖掘与再现。”庐阳区老城保护更新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华舒介绍。每条小巷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掌故与文化基因,更新工作便以此为线索,进行差异化打造。

以撮造山巷为例,其名源于三国典故,传说曹操曾在此“撮土造山”以登高拒吴。改造中,设计者巧妙地将这一历史文化元素转化为现代语言:巷口立起憨态可掬却又带着几分英武之气的“庐小胖”兵士卡通形象,瞬间拉近了年轻人与历史的距离;巷内青石板路整洁蜿蜒,墙面点缀着融合三国元素的趣味彩绘与浮雕;原先杂乱的店铺门面逐步业态升级,引入茶饮、文创、手作、小吃等多元业态,既古朴雅致,又充满朝气。

昔日破旧黯淡的背街小巷,一跃成为吸引无数游人拍照打卡的“网红”地标,历史在创意中鲜活起来。

而在主打餐饮特色的勤劳巷,改造则注重再现传统街市的秩序感与烟火气。设计团队严格推行“一店一招”,指导每家店铺的招牌在尺寸、材质、悬挂方式上符合建筑风貌,但在字体、色彩、设计上又鼓励展现个性。漫步巷中,只见各式招牌高低错落,古雅的隶书、俊秀的行楷、活泼的卡通字相映成趣。

“这些小巷子重新打造后,真是脱胎换骨了!”老家在江苏扬州的老住户曹正勤感慨道。

曹正勤在淮河路畔生活了 30 多个春秋,扬州的精致婉约是她心底的乡愁,而合肥的包容与奋进是她融入的血脉。她亲眼看着家门口的街巷从破败到新生,从单调到丰盈。“现在既有好看的‘面子’,又有舒适的‘里子’。商业热闹但不失文雅,文化味道浓了,生活也更方便了。每到周末,我总喜欢到街上、巷子里走走看看,摸摸那些有故事的墙,看看新来的有趣小店,感觉自己也跟着年轻了。”

### 焕彩城市公园,延续历史叙事

“以前来逍遥津,就是沿着湖边散散步、看看景,算是老合肥人的一种习惯。”家住阜南路附近的王丽娟,是公园的常客,“但现在不一样了,每次来总有新惊喜。”

作为合肥市第一座人民公园,逍遥津公园承载着合肥几代人的温情记忆。公园南大门的三开间牌楼古意盎然,檐下悬着台阁体题字的“古逍遥津”匾额,抬眼间,便是岁月沉淀的厚重。

逍遥津曾是三国时期魏吴逍遥津之战的古战场。公元215年张辽率八百将士大败孙权十万大军的著名战役便发生于此,“张辽威震逍遥津”的典故也由此而来。这是合肥三国文化的标志性载体。

2020年,逍遥津公园启动闭园提升。

一座承载城市集体记忆的老公园,如何在当代生活中,延续其独有的历史叙事与精神气质?

答案,藏在公园的一砖一瓦、一景一物中。

遵循“微改造、精改造”与“修旧如旧”的理念,公园改造在传承延续三国文化主题的同时,对代表城市记忆的景点和设施予以保留、保护。全新打造的“记忆长廊”以栩栩如生的浮雕,再现“张辽威震逍遥津”的三国故事;逍遥古津、威震江东、大象希声等“逍遥八景”,既展示公园景观风貌,也体现文化传承。

公园内的数字化三国文化沉浸式体验馆三国合肥历史文化馆,动态再现“逍遥津之战”,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历史风云。

如今,逍遥津公园里,蘧庄花戏楼中,黄梅戏的婉转、徽剧的铿锵、京剧的悠扬轮番上演;升级后的休闲步道,游乐区域、场馆,兼顾了不同年龄市民的游玩需求。

今年1月1日,2026庐州灯会在逍遥津公园点亮,园内超50组大型灯景磅礴列阵、上万盏花灯次第绽放,以“穿越了张辽”为核心的沉浸情景剧上演,搭配“天马行空”航模飞行、非遗打铁花等特色表演,呈现传统民俗与前沿科技融合。

逍遥津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孟海涛说,希望在调整功能布局、深挖历史内涵的同时,满足市民对文化、审美与休闲的多元期待。

### 焕活“工业锈带”,融入多样业态

在庐阳区合瓦路,一座由原老旧仓库改造而成的庐州意库,正成为市民体验潮流生活的新地标。在这里,业态布局多元立体,涵盖文创体验、特色商业、休闲娱乐等多个领域……丰富的文化业态,既留住了城市记忆,又提升了文化品质。

“我们希望系统性解决老城区基础设施功能单一、多元文化空间不足等方面的短板,有效带动片区环境和民生设施改善,为片区城市更新提供新的支撑。”庐阳区住建局局长刘斌说。

庐州意库的实践,是合肥近年来系统推进工业遗产更新的一个缩影。作为工业基础雄厚的城

市,合肥拥有大量承载时代记忆的老厂房、老仓库。如今,基于工业遗产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服务在这里集聚——

在由合肥柴油机厂旧址改造而来的“合柴1972”文创园内,昔日的穹顶车间化身为合肥当代美术馆,燃料仓库变成了文创集合店,旧时的岗楼化身观景台……工业的厚重与艺术的先锋在此奇妙共鸣。包河区委常委、副区长韩光辉介绍:“把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相结合,对废旧厂房进行改造,不做‘大拆大建’,最大限度地保留合肥柴油机厂的原有肌理,既保护了历史风貌,又开拓了新的创意空间,一举多得。”

在新粮仓文化商业合集,标志性的筒仓与铁轨被保留,化身艺术展厅与景观线索,讲述着粮食仓储的往昔。万吨筒仓摇身变为艺术中心,画廊、外文书店、设计品牌纷纷入驻。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园区大力引进文创产业,实现从“物质粮仓”到“精神粮仓”的蝶变。“我们还通过VR技术,给观众新体验。”数字内容项目负责人张弛说。自2024年5月开放至2025年底,新粮仓商业合集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万人次,营收突破7亿元,展现出旺盛的市场活力。

在合肥,守护与创新故事每天都在续写。

“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而是对城市文化基因和历史底蕴的挖掘与激活。”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局长张刚说,“合肥的沧桑巨变,每一位生活在这里的市民都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我们可以一起回望来路,找回共同的集体记忆,并从这些记忆中增强认同、凝聚与接续奋斗的力量。”

(作者:王珏、韩俊杰;来源:《人民日报》2026年1月)

本栏目供稿、责任编辑:黄宁平

## 启 事

本栏目属转载文章,因客观原因未及与作者提前沟通,请作者看到本启事后,与本刊编辑部联系(电话:0551-62206629),编辑部将按本刊相关制度向作者支付稿酬。

和以處眾寬  
以接下恕  
待人



中石書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 0551 ) 62206658 62206629  
电子邮箱：XB1233@126.com

印 刷：合肥新南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  
定 价：5.00元

